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王 坚	

《闽都文化》总第91期 2024年第2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林瑶佳 张博雅
编 务 主 任	单 南
编 务	何 玲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陈怡健
本期责任编辑	曾建梅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满地翻黄银杏叶

P10



陆庄之“陆”
——记“宣和二陆”与侯官陆氏

P36

社神在福州



世味流年

- 4 李治莹 满地翻黄银杏叶
- 7 朱 侗 一碗花生汤

左海风流

- 10 孙源智 陆庄之“陆”
——记“宣和二陆”与侯官陆氏
- 17 何金兴 武状元林鏢
- 21 平 之 波折一生，弦歌不断
——郑天挺的学术人生与家庭生活

船政之光

- 27 黄淑贞 船政匠首黄文禧
——一份船政奖札的前世今生

八闽文脉

- 32 张 斌 郭沫若与福州工艺之缘

榕垣旧事

- 36 大 路 社神在福州
- 45 青 色 冶山的“花样年华”

Contents

P45



冶山的“花样年华”

P56



翠环碧佩带当风
——梅溪镇今昔

P85

江户时代的“福州船”



在水一方

- 51 唐 希 梅花千户所
- 56 池宜滚 翠环碧佩带当风
——梅溪镇今昔
- 61 罗榕华 青州之青
- 66 林新洪 水木相融莘口镇

双塔视野

- 70 吴 晟 守望那片海
- 75 鹿 野 风雨荷园
- 80 张兆浩 在罗源行医卅余年的顾玛丽医生

史池钩深

- 85 刘洪哲 江户时代的“福州船”
- 92 郑训焘 / 郑松波 徐葆光使团出使琉球记

- 封面 陈怡健 闽江之上（摄影）
- 封二 黄永定 古村稻熟千层浪（国画）
- 封三 翁承志 游园别记系列 2023 之一（国画）
- 封底 陈玉树 明式多宝阁

满地翻黄银杏叶

李治莹

我16岁那年第一次登上烟台山的缘由是借居于第十六中学，能在风景区流连，便得以观山赏花饱览满目风景。悠悠忘返中，在乐群路上发现有一座通体由花岗石建造的教堂。烟台山上各式各样的建筑物比比皆是，一座石砌的教堂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吸引我的却是教堂庭院前

那一地金黄的树叶。向上仰望，只见那金灿灿的树叶飘落自一棵树上。那时还只是一介少年的我，不知此树是何树，怎么会如此之美。幸得另外两位观赏者正啧啧

称道：“这株银杏树的落叶，好像下金子一样，看看地上，都已经是一地金片了。”借助这路人的几句话，方才知这株会“下金叶子”的树叫银杏树。

那时大约是在深秋后的入冬季节，我知道在自己家乡，有不少树木都已经在寒风中萧瑟了，

渐渐地秃了枝杈。而烟台山上的这株银杏树，虽然落了一地的金黄，宛如一张厚实的黄金毯铺在地上，但树枝上依然枝枝相随，叶叶相叠，一树金光灿灿，甚是迷



人。从此，不但对于称之为“银杏”的树印象深刻，而且觉得这烟台山也因此神圣了。就是一株树，都能美得让人挪不动脚步，那么，一整座烟台山呢，该有多少奇美？！

不多日，我回到了家乡，专就银杏树翻查字典，从中知晓此树是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孑遗植物之一彩叶树种。此树除树形优美外，最是那独特的四季变化的颜色，春夏季叶色为嫩绿，深秋或入冬时节则变成纯美的黄色。且绿与黄各具其美，绿是嫩绿，黄是金黄。前人诗云：“满地翻黄银杏叶。”便是金秋的写照。

少年时曾经来过省城已足以令我骄傲，然而更加让我豪气的是8年后因为上大学又来到福州了。因此常常想：或许自己与这座城市有不浅的缘分。果不其然，当时只是福州的临时市民，直至岁月把自己从青年演变成一老者，终于可以成为福州的永久居民了。与福州城有缘分了，也就与烟台山有缘分，因为福建师大不仅与烟台山同在仓山区，而且还是近邻，说烟台山是师大的后花园亦不为过。当年入学后不久，就很自然地想起烟台山的那株银杏树，特别是树下的那一地金黄。萦绕于心的思绪，让我在第一个学期的秋末初冬时节重上烟台山观赏银杏树。那日，微风徐徐，暖阳高照，正是赏景好时光。走近银杏树，只见一树金黄色的光影闪烁，耀眼夺目。一阵微风吹过，那光芒就在树叶间跳跃，仿佛无数吉祥的小精灵在欢愉地嬉戏。最是此树立根之地，飘飘忽忽的落叶让地上均匀地叠起一层薄薄的金叶



之毯，璀璨的金光与树上的光影，相互映衬，奇妙有如梦幻一般。

此株银杏树立于石厝教堂庭院之前，而这座石厝教堂是当年英国基督徒们集资兴建的。英国人之所以建此教堂，是因为当年先后有17个欧美国家在烟台山设立了领事馆。英、美、法、德、日、丹麦几国还在烟台山的山前山后建起了别墅、官邸等建筑物。或许是多国侨民聚居于烟台山，为了有个聚会场所，英国侨民、特别是虔诚的基督徒们率先建造起这座石厝教堂。随着世事的变迁，政权的更迭，外国人走上烟台山，又离开烟台山。各国侨民有如候鸟，千万里“飞”

回自己的国度了。石厝教堂这座所谓的“国际教堂”也就随之而起变化，由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最终荒废于一隅。当年英国人是怎样建起教堂的，又是怎样与外国侨民们在教堂做礼拜的，后来又是如何离开教堂一去不复返的？或许，只有叩问这银杏树才会有答案，因为只有此树见证这一切。

在那个时期英国人建教堂，其主要目的在于祈祷神降福免祸，以及精神的奉献、道德的提升等。但他们在大兴土木建教堂的同时，他们国内的同胞却做了与道德提升完全相悖的事。

“意外艺术”创始人“意公子”是我当年师大的同门学妹，她曾经做了一档节目，称为《这片树叶改变了世界》。其主题就是揭示19世纪之后，中国给英国人提供的是大量的中国茶，而他们的“回馈”却是一整船一整船的鸦片。当时有个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人，进入福建后就直奔主要的茶产地武夷山，偷窃了数量不少的最优质的茶树种。当英国人产出香茶后，英政府及其奸商们就切断了中国茶的进口线，但却延伸了鸦片输入华夏的长度。我在听取意公子这档节目后，就在想，这个偷窃中国茶树种的罗伯特·福琼，进入福建后不知有没有在烟台山的石厝教堂做过礼拜？他祈祷的又是什么？不知他是否为英国人卖给中国人大批量的鸦片而忏悔过？这一个个的问号，或许同样只有教堂前的这株银杏树才能解答。因为唯有它阅尽了人间烟火、世事沧桑，从中知晓并见证了所有。

癸卯年中秋节那天，我又一次登临早年别称为狼烟墩台的烟台山，再次观赏这株银杏树。离深秋还有些时日，印象中总是金黄色的银杏树，眼前却呈一片翠绿，又是另一番好景致。随着季节鲜明地改变颜色而“判若两树”的现象，或许在植物界并不罕见。但烟台山的这株银杏树从绿色向金黄叶的转换，与深山密林中的银杏树截然不同。因为100多年来，不是所有的银杏树都能如此阅尽人间世事无常沧桑变化的。一代江山一代人，一朝一暮一风尘，这株银杏树无不历历在目。且不说如何年复一年地物是人非，就是与它近在咫尺的石厝教堂，不也是不可抗拒地由盛转衰？而任何变化都躲不开这株银杏树。它树上的每一叶片，似乎都是一张写着历史变迁的纸张。倘若在春夏把一树的绿叶、又在秋冬把一地的金黄堆叠在一起，就是一本厚厚的记载着过往今来的大书。百年千载，一树叶银杏树叶不就是一只只锐眼，洞察着树前树后的一切？

在银杏树下久久驻足之后，我带着无尽的思绪转身步入绿树繁花的烟台山山顶上。立于高台眺望，只见中洲岛前簇拥的是很有故事的别墅群，中洲岛后延伸的是繁华盛景下的中亭街。而中洲岛下，那一定是已经翻山越岭奔泻前来、又浩然奔腾远方的闽江水。依顺着闽江水的流来荡去，无形的思绪也就有如闽江水上的粼粼波光，闪动在闽江历史的潺潺流淌中。

烟台山上的银杏树，是见证历史的珍贵之树，也成为留住我的梦幻的一棵树。

一碗花生汤

朱 侗

如果说我对福州的第一印象是满城的山围和榕树，第二印象则是一碗甜糯糯的花生汤。

2018年6月初至福州实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何去何从，心中并无答案。某天，男友小崔兴冲冲道：“学生街附近有家花生汤，带你去尝尝。”那是平生第一次接触这道美味。汤呈半透明的奶白色，花生颗粒分明，漂浮在碗面，浓香久绕不散，一碗慢品，软烂绵密，入口即化，甘甜有度，清爽不腻。忧烦去掉大半，异乡人似乎在迷茫中初拨云雾。实习结束后，去向终明，我与小崔步入婚姻殿堂，定居福州。此后，每每心有烦闷，喝一碗花生汤，便甚觉清甜爽利，身在有福之州，温暖和希望总在奔涌。

福州人骨子里“嗜甜”，不仅花生汤，炒菜放糖、做肉放糖、煲汤放糖，拌凉菜也放——肉眼可见“糖分超标”。他们究竟为何对“甜”情有独钟呢？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曾述“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以贡品之姿上供，可见其时珍贵。后至元朝，福州作为重要港口，制糖工艺已达世界高水准，故蔗糖制品远销至海外。马



可·波罗在游记里亦记录了此盛况：这个地方以大规模的制糖业闻名，出产的糖运到汗八里，供给宫廷使用。明末清初时期，蔗糖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三大法宝，可与丝绸和瓷器比肩。再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写道：福州人爱吃甜，吃到牙齿“十人九坏”。

花生汤、花生汤，最重要的原材料当然是花

生。据《明史》记载，正德六年（1511），当时被中国人称为“佛朗机”的葡萄牙人以武力占领了满刺加（今马来西亚），不久又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约16世纪中期，一些闽籍海商私自与葡萄牙人有商贸往来，花生很可能就是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得到并引种回家乡。浙江明代方志中有“落花生原出福建”的说法，清人张璐《本经逢原》记载“长生果产闽北”，这表明福建是引种花生最早的地方。而花生又被人们赋予吉祥美好的寓意，在福州乃至整个福建地区的节日中被“委以重任”。每逢小年，福建几乎家家户户要祭灶，以“灶糖”供奉灶王爷，祈愿黏住他的嘴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遍观“灶糖”，豆脆糖、面糖、花生脆糖、芝麻糖、炒米糕……或多或少都夹杂有圆滚滚的花生仁。

关于花生汤这道美食，流传着一个说法，至今为人引怀。相传在明代的南后街，有一穷书生，名叫林福，终日奋发苦读，同时不忘帮母亲煮汤供作早卖。由于专注诗书，他剥壳时常常不经意将花生在掌中摩擦，花生粒红衣脱膜成为白仁；煮汤时，每每火势微小，林福方记起添柴，汤水快干才想起加水，这一连串举动“无心插柳柳成荫”，煮出来的花生酥烂不碎，漂浮汤面，入口即化，而且汤色乳白，甘甜爽口，与别的卖家相比更胜一筹。后来，林福京试高中榜首，便有人称之为“状元花生汤”。此后“状元花生汤”亦声名远扬，寄寓着闽地人民甜甜蜜蜜、幸福美满、长寿多福的美好愿望。

适时添水，慢火细煮，花生汤熬煮之法，我以为恰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异曲同工，可摸索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事勿急躁，做人求踏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方可走出一片敞亮天地，烹饪一道“人生佳肴”。

现如今，福州大街小巷林立着不少花生汤店，其中“没牙伯花生汤店”是较为出名的店铺之一，地址在台江区老药洲街182号。店铺不大，却是由来已久，“一波三折”。据说该店共经历过三次搬迁。起初是创始人陈天华夫妇推车沿街叫卖，夫妻俩年事已高、牙齿几近掉光，这也是“没牙伯”称呼的由来；后夫妇俩在大桥头天华剧院旁租赁一家小店，许多老福州人又称其为“天华花生汤”；不料又遇拆迁，消失一段时间后，店迁到如今的街道。算下来，这家店兜兜转转一直在台江区，最初的食客循着记忆中的“古早味”光顾不断。店里可选食物，除招牌花生汤外，还有八宝芋泥、糯米饭、花生糕、藕粉和茶叶蛋，都是老福州人离不了的念想。2014年，“没牙伯花生汤店”被列入第四批“福建老字号”。

因着与花生汤的特殊“情缘”，路过这家店时，我不假思索地融入食客大潮。店铺内人头攒动，老的少的、浓妆的淡抹的、落单的成对的、本土的外地的……食客们点单结账、端盘落座、享受美味，一气呵成。这波吃罢下波又来，交流声不绝于耳。稍稍听下，无外乎夸赞、惊叹、回味、比对其他家之类。“再打包两碗花生汤”，更有许多未尽兴的，两手提溜带回家。宋代黄庭坚



诗云“昏昏市井气，咕咕儿女语”，此情此景，正当此诗。

一勺接着一勺，味蕾满足之时，脑海里扑腾出老家的“花生米汤”。童年时期，每逢花生成熟时节，我与父母一同下田收获。某个周末，夕阳西下，我攥住一捆绿色，父母亲拿起小铁锹斜向下深插，我再用力一拽，大把新鲜“落花生”混着湿泥土的清香面世，顺手放在就近的“堆积点”。动作反复数次，一家人长长的影子映在黄土地上，笑声爽朗。待到天色将黑，视线模糊，父亲将“堆积点”的一捆捆花生装进麻袋，肩扛装车，带着劳作和丰收的喜悦归家。

趁着新鲜，取出适量留作自家吃，其余“大部队”，将在今后日子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花生个大肥美，抓一把薅至筐中，清水反复淘洗，待外壳泥巴完全洗净，剥出一盘花生

粒，与大米一同下水入锅。大火烧至沸腾，转为小火，半小时后关火，焖十分钟。开盖，颜色嫣红，花生香味满屋，此为“花生米汤”。每人盛一大碗，依喜好放糖后，先置于桌上不动，待肚子吃得半饱，汤面上会凝成一层“花生米油”，再端碗吸溜，最精华的部分就算是入了肚。花生沉在碗底，用勺子旋转捞出，大口咀嚼，甜到心里，肠胃立刻满足。这样煮出来的花生粒，口感偏硬，嚼起来“咯吱咯吱”响，却是越嚼越香。待彻底嚼成碎末，一顿饭的末尾，就算甜甜蜜蜜、有滋有味了。

福州的“花生汤”，老家的“花生米汤”，一字之差，做法不同、口感不同、“卖相”不同，却透露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蕴藏着不同地区人们对家乡说不清、道不尽的牵挂。老家的甜食还有很多。妈妈做的油炸糕，圆圆的像月亮，金黄色外皮又酥又脆，咬下去油点四溅，边嗔怪烫嘴皮边大口嚼咽，满嘴满手也全然粘油；爸爸做的绿豆棒冰，一锅煮至软烂的精选绿豆，放进大把白糖，从热气腾腾放到彻底凉透，一勺舀进模具，冷冻几小时，咬一口，简单纯粹的甜，一夏天的暑气尽数消散；还有外婆做的红糖三角包、玉米醪糟羹、拔丝金红薯……不知不觉间，思绪飘飞。

是啊，一碗花生汤，不仅萦绕着古早情、市井情，还牵引出浓浓的故乡情。汤快见底，端碗，仰头，连带那些情，顺着喉舌，一并淌过心田。

陆庄之“陆”

——记“宣和二陆”与侯官陆氏

孙源智

—

福州西门外有一处名为陆庄的地方，是侯官陆氏家族在福州生活过的主要痕迹。北宋末年，显赫一时的陆蕴、陆藻兄弟在此筑山造池，兴建园林。陆氏家族后来逐渐衰落，陆庄园却仍是福州城西的一处名胜。明初诗人王偁尝游此地，有《陆氏山池》一诗描写其景色：“淡淡牵银藻，娟娟种玉莲。谁闻照胆镜，中有洗心泉。萍散山流影，云收月堕天。愿随鸥鹭侣，薄暮宿寒烟。”等到了明中叶，陆庄园“悉为平畴”，再也不见踪影，但陆庄的名字又被叫了五六百年，一直沿用到今天。

陆庄园最初的主人陆蕴、陆藻，是活跃于北宋后期的政治人物。兄弟二人并时知名，先后进士及第，充任馆阁学士，又都回到福建为官，留

下不少佳话。宣和（1119—1125）初年，陆藻赴泉州上任途中经过建州，与时任建州知州的兄长陆蕴相会，“合乐燕款，闽人以为盛事”，后人因此又称陆蕴、陆藻为“宣和二陆”。南宋文坛领袖刘克庄追慕前人，曾写下“大陆题诗小陆和，宝鞍画戟传呼过”的诗句，说的就是这兄弟二人。

陆蕴、陆藻所在的侯官陆氏是宋代福州著名的仕宦世家。该家族出自吴郡陆氏，其族兴起于



地铁陆庄站

汉末，历六朝鼎盛不衰，至唐代仍有6人拜相。唐末五代时期，陆蕴兄弟的先祖陆权出任建安县丞，为避战乱举家迁徙到福州，从此成为侯官人氏。此后数十年，福州先属闽国，后属吴越，又随吴越纳土归宋，陆权的子孙也先后在吴越与宋朝为官。陆蕴高祖陆崇宸在北宋前期官至殿中丞，历知泸、道、潮、贵四州，有能吏之名。到了北宋中后期，侯官陆氏又在科举上取得非凡成就，短短百余年间有15人相继登第，“闾里称为显族”。

侯官陆氏家族的科举成就，与北宋福州深

厚的儒学氛围有着密切关系。北宋时期，被称为“新儒学”的理学开始兴起。在许多儒生还沉溺于文字雕琢之时，福州的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等四人高倡知天尽性之说，成为推动理学在福州发展的先驱，被后世学者尊称为“古灵四先生”。在这四人中，周希孟是二陆父亲陆宣的老师，陈襄是二陆的堂姑父。侯官陆氏的众多成员也都参与了以“四先生”为核心的福州儒学圈子的构建，二陆的族弟陆祐是最杰出的代表，曾与朱熹的三位老师刘勉之、胡宪、刘子翬交游，在福州讲学传道，门生众多，世称“支离先



陆庄河

生”。

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陆蕴、陆藻兄弟联登进士，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陆广登甲科，开侯官陆氏世代科甲之始。二陆的父亲陆宣是陆广的侄子，也是这个家族中第五位进士，官终朝散郎、知潮州。陆蕴、陆藻兄弟分别在哲宗与徽宗时期考中进士，等到二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北宋王朝已迎来落幕前的夕晖。

二

陆庄的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陆氏聚族而居的地方，其实陆庄园是陆蕴、陆藻别居饮宴的园林，三坊七巷的衣锦坊才是二人安宅之所。衣锦坊旧名通潮巷，陆氏兄弟是最早衣锦于此的人。西楚霸王项羽灭秦后，曾说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耳”的名言，后人就用“衣锦”来指代得官后荣归故里。二陆既为福州人，又先后出任福州知州，被时人认为是莫大的荣耀，便又取《诗经》中“棠棣”的典故，将他们所居住的坊巷命名为“棣锦坊”。所谓“棣锦”，即兄弟

二人都能衣锦而归的意思。到了南宋，另一位退居此处的官员王益祥不愿衣锦之荣被陆氏兄弟所独享，便将坊名更为“衣锦”。衣锦坊之名便一直沿用至今。

若论衣锦之荣，陆蕴、陆藻无疑是侯官陆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在他们之前，家族中虽然已出现八九位进士，但官职普遍不高；在他们之后，陆氏家族开始由盛转衰，再未出现像二陆这样显赫的人物。北宋末年，陆蕴、陆藻凭借过人的才气与独特的际遇，成为皇帝信任的侍从之臣，官至诸阁直学士，留下了不少至今仍然有迹可循的故事。陆蕴更是跻身《宋史》，以诤臣的形象留名青史。

陆蕴（？—1120），字敦信，绍圣四年（1097）进士，仕哲宗、徽宗二朝，曾担任太常少卿、国子祭酒、中书舍人、大司成、御史中丞等要职。在被擢升为御史中丞时，陆蕴考虑到和副宰相余深同为福州人，曾上书请求回避。宋徽宗为此亲加劝慰说：“回避是要防范有关官员不能忠诚为公，你是我所了解的人，一般官员不能相比。”由此可见宋徽宗对陆蕴的重视与信任。政和七年（1117），陆蕴以朝奉大夫、龙图阁待制出知福



州，不久移知建州，加显谟阁直学士。宣和二年（1120），陆蕴因事夺职，旋即再起用为集英殿修撰。同年去世，赠太中大夫。

在党争激烈的北宋后期政坛，陆蕴的仕途算是非常顺利了，但他的心情却并不轻松。陆蕴有一首题为《感皇恩·旅思》的词传世，他在词中这样写道：

残角两三声，催登古道。远水长山又重到。水声山色，看尽轮蹄昏晓。风头日脚下，人空老。

匹马旧时，西征谈笑。绿鬓朱颜正年少。旗亭斗酒，任是十千倾倒。而今酒兴减，诗情少。

此词题目写旅思，实际上是陆蕴对自己宦宦生涯的反思。上片写旅途之景，以残角的呜咽声起调，层叠无尽的山水更引出词人的忧愁。多年来的宦宦历程仿佛这重复的“远水长山”，宦宦的劳碌不过是轮蹄空费，让人难以看到志向实现的希望。下片回味旧况，从福州入京需要走西驿道，“匹马旧时，西征谈笑”正是陆蕴初入仕途时的意气风发。与当初的踌躇满志相比，回首望去，一生蹉跎，词人难免“酒兴减，诗情少”了。

陆蕴、陆藻进入官场时，王安石学说成为显学，风靡天下。侯官陆氏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关系密切，王安石曾为陆广作墓志铭，新党重臣、福清人林希是陆广的女婿。陆蕴、陆藻二人都以新学入仕，后来又担任学官，为王安石新学助长声势。陆蕴一度主管全国学政，制订出考核各地学政官员的制度，推动兴学校、改科举等一系列新法政策的施行。这些兴学举措，尤其是地方学官的出现和府学县学的推广，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对于当时的北宋王朝而言，虚假繁荣下国力的极度空虚与激烈党争带来的严重内耗，才是朝廷更需要急切关注的问题。在被提拔出任御史中丞后，陆蕴不只指出朝中权贵及大小官员肆意侵犯民财，甚至还对宋徽宗奢侈的生活方式与轻佻的执政风格做出严厉的批评。陆蕴正直的言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史书称他论事割切，所言皆中时病。南宋学者袁燮在看到陆蕴的《中丞陆公奏稿》后，也不禁发出感慨：“当是时士大夫柔佞成风，而独能排奸如此，所谓凤鸣朝阳者耶？”但此时大厦将倾，北宋王朝已绝非一位言官所能拯救。



三

陆蕴、陆藻兄弟在北宋后期的政坛上活跃了20多年，由于陆蕴在史书中的诤臣形象，不少人想象他与权相蔡京之间的对抗关系。实际上，蔡京不仅是当时的新党领袖，在闽籍官员中也有着巨大的威望。陆蕴、陆藻仕履与蔡京的政治进退高度重合，两人很大可能是蔡京党人，或者至少与蔡京党人过从甚密。二陆党附蔡京的缘故，我们可以从陆藻的文字中窥见一二。

陆藻（？—1127），字敦礼，崇宁二年（1103）中进士，仕徽宗、钦宗、高宗三朝。据《夷坚志》记载，陆藻曾梦游水神顺济王的宫殿，顺济王预言陆藻将来会官至显位，并在临别时以“顺风”送陆藻归去，同时还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风之顺逆，亦非可私，特世人弗之知耳。”既然神仙都无法掌控风向的顺逆，那么像陆藻这样的世人顺应政治风向，似乎也无厚非了。这个故事脱胎于陆藻自己撰写的碑文，后来陆藻在蔡京复相后迎来了政治机遇，累官嘉王府学官、给事中、吏部侍郎、显谟阁直学士，历知潭、泉、福三州，也算是应了当初顺济王的预言。

顺逆，在当时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即表示所做的事情正当与否。同样依附蔡京官至高位的名臣吴敏，在出任宰执后便着手清算蔡氏当政时的种种弊端，被人称作“逆取顺守”。陆蕴与陆藻的作为同样也有“逆取顺守”的意味。陆蕴曾推

荐提拔洛学人士廖刚，又主动要求跟蔡京的死党余深避嫌。陆藻与名臣李纲交情深厚，诗词唱和颇多，后来他与李纲均受吴敏引荐，受命于金宋交战的危难之际。李纲保卫京师安危，几乎挽狂澜于既倒。陆藻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拱卫汴京南门。可惜不久后，吴敏、李纲在权力斗争中落败，陆藻再次罢落提举宫观的闲职。随着东京开封在靖康二年（1127）陷落，北宋宣告灭亡，陆藻也在不久后去世。

无论陆蕴还是陆藻，均是以词臣入仕而受到重用，最后卷入权力斗争之中。虽然他们都试图在政治上做出一番努力，但在北宋王朝形如朽木的情形下难有作为。与兄长陆蕴一样，陆藻在官场中同样深感无力。我们在陆藻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文字中，还能够感受到他对隐逸的憧憬。在出知泉州时，陆藻用“名齐庐阜久传世，身异商山深采芝”称赞五位退居于此的官员，这里提到的庐山与商山都是古代名士隐居之所。在更早时候，陆藻曾与陆蕴同贬虔州，两人在瑞金县东明观前的泉水处烹茶赋诗，陆藻留下了“轩前山色依然绿，溜下泉声漱玉寒”的名句。这句诗化用了陆机《招隐诗》中的“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一联，文字中透露出气质高洁的自我嘉许与激励，也表达了兄弟二人在志向情操上的追求。

虔州即今天的赣州，这里对于陆氏兄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二人被贬虔州之事发生在大观三年（1109），时任御史中丞石公弼在弹劾蔡京罢相后不久，又以庙制不符合礼仪发难，致使

太常少卿陆蕴贬知瑞金县。陆藻主动请求分担兄长罪责，也被贬为南康县丞。在贬居的这两三年时间里，感情甚笃的兄弟得以时时相聚，酬唱连篇。世俗政治上的不得志，也促使两人寄情于方外。正是在这里，陆藻为奉祀临济王的庙书写碑文，借临济王之口留下了“风之顺逆”的感叹。陆蕴则与其他当地官员一同参与了通天岩石窟的开凿。

时至今日，赣州通天岩仍然是江南少有的石窟寺，保存晚唐至宋代的佛教造像 300 多尊。由陆蕴供养捐造的忘归岩 5 号龕在其中尤为精美，龕中雕塑的迦里迦尊者是代表通天岩石窟最高艺术水平的造像之一。二陆在福州有多处宅院，后来也曾在地为官，但那些象征着昔日显贵的亭台楼榭早已消逝，只有这尊佛教罗汉造像穿越了历史，时隔千年仍栩栩如生。



通天岩罗汉窟，左为陆蕴舍造

四

日暮马嘶人去。
船逐清波东注。
后夜最高楼，还肯思量人否。
无绪，无绪。
生怕黄昏疏雨。

这首《如梦令》是陆藻侍女所作，全词描写别情，充满落寞之意。陆蕴、陆藻以诗词知名，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文士，甚至连侍女都能在席间顷刻成章，一时传为美谈。两人能够获得徽宗皇帝的青睐，或许也与他们的艺术造诣有关。但他们的诗词大多失传，有“文彩飘飘青琐郎”之誉的陆藻只留下一首应酬诗，陆蕴也仅一首词传世，反倒是这位无名的侍女流传下两首作品，频频为历代诗话所提及。当初陆氏兄弟“西征谈笑”，试图成就一番功名，终是“清波东注”，只留得身后寂寞。

随着靖康之变的发生，北宋遽然而亡。宋室南渡后，随着政治倾向的转变，贬低新法成为时论的主流。南宋学者多称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从而将北宋后期的众多官员一举抹杀。与新党联系紧密的侯官陆氏也在南宋以后渐至没落，虽仍有多位成员进士及第，但

都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少有作为。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士人阶层为代表的新贵族已经开始脱离土地的束缚，社会流动渐趋频繁。侯官陆氏也不例外，在其家族发展的过程中，陆广安葬杭州，陆长愈易籍开封，陆祺老改贯临安，陆伯正、陆闻雷落户长溪，家族成员渐渐流向全国，星散于各地。到了元明以后，我们已难见到侯官陆氏的身影了。现在人们提到福州望族的时候，也很少会想起这个曾在宋代辉煌一时的家族，只有陆庄的地名还保存着这段家族的些许记忆。

今天的陆庄社区位于杨桥中路与西洪路之

间，在临街高楼的环抱下已难想见当年的景致。一条陆庄河贯穿境内，据说其前身就是陆庄的护院河。两座清代石梁桥横跨于河上，一名高峰，一名陆庄，均是从宋明时期流传至今的名字。陆庄河沿岸分布着高峰亭、思乡亭、后浦境、高将军庙等建筑，成为陆庄百姓民俗活动的保留。当初陆藻知福州时，曾在安泰桥、去思桥建造桥亭供行人休憩。时隔千年，如今的陆庄桥上仍坐落着今人新建的桥亭。陆庄早已没有二陆的后人居住，但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似乎仍有着穿越古今的默契。



陆庄桥

武状元林鏢

何金兴

利桥街，是千年古邑福清现存较为完整的一处历史文化街区，文脉绵延，人文荟萃。从宋到明、清，有资料可查的进士达17人，仅宋淳熙十一年（1184）就出了同科三进士，同年更是诞生了福清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林鏢（U96b）。本文试着透过片鳞只甲的述载，还原那段历史云烟和主人公的精神图谱。

一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林鏢高中甲辰科正奏武状元，成为福清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彼时的临安府，虽不及长安万人空巷只为一睹状元的盛况，也不及北宋汴京《清明上河图》的繁华，但临安府毕竟也是南宋的都城，每三年放一榜的武举制度，与文举并行，受关注度不言而喻。

可以想象一下，玉树临风的林鏢一举夺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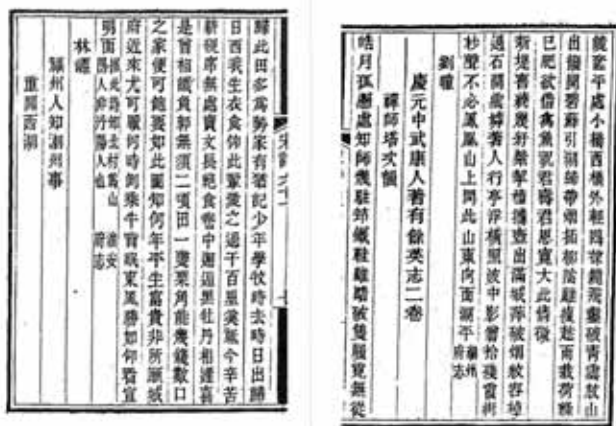
后，春和景明，约上同榜好友，畅游西湖时该有多么的意气风发。曲江已成历史云烟，西湖却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朝廷的大门已经敞开，天高任鸟飞，胸中的丘壑即将舒展成千里山河。

然而，后世关于他的记载甚少，能查阅到的典籍方志也是寥寥数笔。因为他长期在外为官，家乡人对他也挺陌生。幸运的是，在侨乡博物馆的历代进士榜上，得以一睹他的风采：五官棱角分明，眉宇间透出干练气韵，美髯低垂，眼神专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而他身穿的绯色官服，说明他生前官居五品以上。

作为正奏武状元的林鏢，一身武艺，不仅有诗词传世，还编撰过《永阳志》35卷，可谓是一表人才，文武双全。如此俊杰，更增加了我们探寻先贤的好奇心。

想要认识林鏢，宋朝的武举制度是绕不过的坎，武状元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南宋的武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



《宋诗记事补遗》中收录的林颢诗作

种，它与进士科、明经科并列，是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之一。自唐代以来发展到南宋，武举制度已经深化，考试难度非常大。考生需要通过地方试、省试和兵部京试三个阶段的考试，才能够最终参加殿试争头魁的终极对决。与我们臆想中的不同，武试不像影视剧里比武招亲的那样两两捉对厮杀，而是要求“弓必开满，刀必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合格后方能参加下一轮的笔试。

有人不禁要问，武举还要笔试？对，宋朝要求“以策论定去留，以弓弦定高下”，非能文能武者，请绕行，此路不通。

可想而知，布衣之身的林颢，即便没有闻鸡起舞，也必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么问题来了，苦练加苦读就有机会考上吗？

答案是不能，因为你忽略了经济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不说武举需要缴交一笔数额不菲的报名费，单论学习条件，要参加骑

马射箭的考核，你总要买得起一匹好马供练习用吧，这和当下研修音乐总得先买架钢琴，请得起声乐老师一个道理。

管中窥豹，可以推理出当时福清的经济繁荣和石塘林氏的昌盛，林氏先祖曾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从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到靖康之难、士族南迁，时称望县的福清，经济飞速发展，税赋居福州府首位，辟耕地、建盐仓、办书院，仅宋朝就出了421位进士。时势造英雄，林颢，作为福清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别辜负了这枚金字招牌呀！

二

意外还是出现了。别说旁人，就连当年的主考官王藺也感到意外。

及第后，林颢约上同榜武进士陶天亮一起拜谢主考官王藺，相当于承师恩、拜码头，在科举场上很常见。王主考早知他武艺高超，又一表人才，当下满心欢喜，有意举荐他到军中任职。谁知林颢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肯就职。

王藺不解，非常惊诧地问道：“自古文武本出自一途，朝廷开设武科、建立武学，就是为了选拔将校，充实部队，使文人知武，武将通文，以提高军队整体素质，改变朝廷在军事上常受制于外夷的状态。今天你们几位心怀大志、腹有良谋、身怀绝技的有为青年，为什么在高中之后不愿从军？这不是违背自己的初衷了吗？”

谁知听了一番大道理后，林燮的回答甚为奇葩：“我不能忍受笞捶之辱。”当时，宋军实行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称为“阶级法”，要求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否则会遭受体罚。林燮给出的理由相当于两人干仗，死都不怕，却向对方约法三章：一、打我可以，不许打脸；二、头可断，发型不能乱；三、打我可以，不许告诉别人。

于是，研究者很容易得出结论：林燮是读书人的模范，自尊心强，那么，林燮真的是因为怕“笞捶”而放弃军旅吗？

据载，绍熙元年（1190），升为副宰相的王蔭向皇帝进言，请求禁止军帅笞辱武举从军者，得到批准。而《宋会要》载：“绍熙五年（1194），二月二十五日铨试、公试、类试，命监察御史曹三复监试……合门舍人林燮考校。”也就是说，从1184年考中武状元到1194年考核成功即将外任的十年间，林燮一直以合门舍人的身份负责皇帝朝会、宴享时赞相礼仪，即便其间军中废除了“笞捶”，他也没想要调任军职。看来“怕笞捶”不是他放弃军旅的真正原因。

那么他为什么要编这个理由来搪塞主考呢？

《宋会要》载：“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十一日，尚书省拟到武举正奏进士林燮以下四十三人，推恩第一名、第二名补保义郎……”保义郎是级别很低的武官官阶。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宋朝一直忌惮武将，制度的制订自然也是重文抑武。就拿武举来说，三年一次的全国性选拔，每次仅录用几十人，有时甚至是个位

数，达不到规模，自然在军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且多从事宫殿护卫之类的工作，不可能复制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痛快和恣意。

在宋朝，文人的社会地位无比高涨，不管国家治理还是领军打仗，文官都要优于武将。武进士是宋代仕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虽习弓马刀剑，但大多数以士大夫自居，林燮的长子林茂，宋登进士，官河南归德府知府。从他对孩子的培养方向来看，并没有继承武学，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林燮想弃武从文，进而一展胸中宏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青年才俊林燮，在他一举夺魁前去拜谢主考前，应该深思熟虑过关于自己的前程，是选择现成的保义郎，还是冒着干一辈子舍人的风险？他或许在春和景明的西湖苏堤上徘徊良久，最终下定了决心，也许是因为100年前，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留下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也许是因为张载替天下读书人喊出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

左手毛笔，右手大刀，蛰伏十年后，经过层层选拔，林燮终于放下扫地僧的活，长出一口气：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第一站，广西；第二站，广东；第三站，安

徽。因为广东潮州留有关于他的简略记载，所以本文继续顺着片鳞只甲，尝试拼接出主角的精神图谱和治政水平。

新官上任，林燮烧出了三把火：体恤灾荒的百姓，奏请免除税赋、开仓放粮；购置学田，兴办教育；倡修广济桥，方便商旅往来。轻重缓急，可谓样样俱到，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绩，莫过于他营治潮州西湖了。

清光绪《海阳县志》述其功绩：“北壕在郡西北一里，即宋时西湖，庆元间知军州事林燮浚。”许骞著述的《重辟潮州西湖记》，则凝练了林燮治理西湖的三个意义——“一以祈君寿，二以同民乐，三以振地灵、起人物”。

最令人好奇的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去疏浚西湖，其主要目的竟然是为了“祈君寿”？从林燮的诗作《重辟西湖》中，也能得到印证，全诗除了描写西湖的美景外，浑然不提西湖的用途，只在收尾处抒情，“欲借禽鱼祝君寿，君恩宽大此情微”。



潮州西湖山上遗留林燮诗题刻

西湖与“祈君寿”到底有何关联呢？

对，佛教。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代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唐肃宗诏天下置放生池 81 处，宋代延续了放生池制度，目的就是“祈君寿”。林燮任潮州时，原来的西湖被当地乡绅、村民侵占为田，湖水淤塞，面积严重缩小，遇到旱季，农业歉收，民生凋敝。免除赋税毕竟治标不能治本，所以，林燮决心要营治西湖。

那为什么要用重建放生池这个理由呢？

根据宋律，对州府城市近郊的建设需要上报，将潮州西湖作为放生池来建设，“祈君寿”的头等理由不仅能迎合圣意，争取到资金支持，还有利于工程的落地，减少数十年来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的阻碍。多少任知府干不成的事，在林燮短短的任上，迎刃而解。

他的智慧，来源于他的悯恤。可以想象，当踌躇满志的林燮初到任地，眼前看到的不是海晏河清、安居乐业的盛景，而是灾荒连连、食不果腹的败象，他的心情一定无比沉重。他憧憬着将来“凿破青云放山出，拨开碧藓引湖归”的画面，他渴望蓄下的甘霖能浇灌出潮汕平原的勃勃生机，他甚至想起桑梓名士郑侠“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的豪迈。

每每看到“祈君寿”的字眼，我不禁会意一笑，不敢有丝毫的鄙夷之情。“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不正是如此吗？

波折一生，弦歌不断

——郑天挺的学术人生与家庭生活

平 之

郑天挺（1899—198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在明清史、边疆史地、史科学、文献学、校勘学、历史档案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幼父母双亡，与弟弟寄人篱下，在亲戚的照顾下成长。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而后留校攻读研究生，师从钱玄同先生，导师中还有陈垣等老先生。1924年开始，郑天挺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天挺先生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堪称一代师表。

一、长乐岱阳郑氏

郑天挺祖籍福州长乐区首占村。首占村，古称岱阳，因其在南山之南、下洞江之北，故称



郑天挺

“阳”。郑氏是岱阳的名门望族，岱阳郑氏发迹于明代，七世祖郑世威于明嘉靖己丑（1529）中进士，成为岱阳郑氏第一位进士，曾手书“世培忠厚”，制匾挂于郑氏宗祠作为祖训。清代，岱阳郑氏曾出现“一门五进士、五世十举人”；清光绪帝钦赐“祖父子孙曾、伯叔兄弟至，科甲联镫”金匾。到了近现代，郑氏家族也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史学家郑天挺、鸟类学家郑作新、现代文学家郑振铎等。

郑天挺的父亲郑叔忱是长乐岱阳郑氏第十八

世，字宸丹，自幼生而颖异，笃学，为其祖父郑廷珪所称许，祖母尤其钟爱。清光绪十五年（1889），郑叔忱在乡里中举，次年便中进士，是岱阳郑氏“一门五进士”中的第五位。此后，郑叔忱即在翰林院任职，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务长，还升任奉天府丞兼提督学政。郑叔忱在北京任职期间，两位哥哥和在江西任职的弟弟先后去世，当他准备将母亲接至北京供养时，母亲也离世了；其身心接连遭受沉重打击，悲痛中一度缠绵病榻。病情好转后，郑叔忱即广召子侄来北京，教导政事和辅导学问。郑叔忱一生为官清廉，酷爱藏书，俸禄除购书外，大多用来接济关照亲戚（包括推荐梁济应征奉天经济特科）；因此，郑叔忱离世时年仅43岁，除了书籍之外，并没有多少遗产留下。

郑叔忱的原配吴氏早逝，继配陆嘉坤，是中国女学的先驱。陆嘉坤（1869—1906），字苻洲，广西桂林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1896年与郑叔忱结婚，育有三子一女。1905年郑叔忱去世后，迫于家庭生活所需，她应傅增湘之聘，携家搬到天津，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堂总教习。任职期间，她博取各地学校章程，参考日本女学之长，制定了学校的校规、课程、自习、赏罚等章程，各地女校竞相借鉴。1906年，陆嘉坤因探视友人而被传染了白喉，当年9月，病故于天津，年仅37岁。而二子一女“并染于疫”，同年郑天挺其姐、二弟夭折，遂与三弟寄养在梁家，由表舅梁济（字巨川）监护，直到长大成人。

二、梁济、张耀曾的帮助

郑天挺与梁济（1859—1918）、梁漱溟（1893—1988）父子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郑天挺的外祖母姓梁，是梁济的嫡亲姑母，梁济的姑丈陆仁恺也就是郑天挺的外祖父，所以，郑天挺的母亲陆嘉坤是梁济的表妹，郑天挺与梁漱溟是表兄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郑叔忱在北京病故。临终时亲友都聚集一堂，而郑叔忱独独找梁济托孤，他对梁济的信任可见一斑。郑叔忱离世后的次年，郑天挺的母亲陆嘉坤也病故于天津，梁济就把两位外甥即郑庆牲（天挺）及郑庆珏（字少丹）带到北京家中，由其夫人张春漪（时为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监学）负责抚育教养；郑家留下的遗产，梁济也“为之经营把注，前后十余年”。此后，对于“伶仃孤儿”的郑天挺兄弟，梁济从生活、学习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充分的照顾。

梁漱溟的舅舅张耀曾（1885—1938），字镕西，云南大理人，白族。中华民国的政治家、法学家，《临时约法》的重要起草人，曾任孙中山秘书。张耀曾、张辉曾的母亲陆嘉年是郑天挺母亲陆嘉坤的亲姐姐；因此，郑天挺与张耀曾、张辉曾兄弟为姨表兄弟。张辉曾曾经教郑天挺、张耀曾“识字读书”。张辉曾是研究程朱理学的，他的思想对郑天挺影响颇大。1902年，张耀曾、

张耀曾父亲过世，也是托孤梁济，梁济同样把张家遗孤接到了“扁担胡同宅之西院”共同生活。这与郑天挺的经历很相似，因此，郑天挺与张耀曾之间，除了亲缘关系与相交情谊之外，还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1922年，郑天挺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生活十分困难，曾到张耀曾任会长的法权讨论会担任秘书，以补贴生活。担任秘书期间，郑天挺在张耀曾的帮助下，编著完成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并于1923年出版。1924年，郑天挺至北大任教，其间与张耀曾几乎形影不离。在郑天挺步入社会的早期，张耀曾不遗余力地给予他许多帮助。

1938年7月30日，郑天挺在昆明，从报上得知张耀曾一病不起。“溶西表兄于二十六日伤寒不起，乍读不敢相信，继读不觉泪下。”当即致电张表嫂询问情况，得知张耀曾生命垂危。张耀曾病故于上海法租界（年不足54岁）后，8月23日，郑天挺经越南海防、香港，不远万里前往上海奔丧，并帮忙操持葬礼，且亲题挽联“廿载追随，亲同骨肉，义兼师长，海迪提携无遗力；万方多难，国丧桢梁，民失喉舌，扶持匡济更何人”，并写下《西表兄像赞》以悼念张耀曾。其大嫂、三姐告以张耀曾病状，“似为医生所误”，郑先生不由得大呼：“伤哉！伤哉！”张耀曾垂危一语为“汉口无恙否”，堪比陆放翁。郑天挺后来得侄女张宁珠信，禁不住悲呼：“呜呼！此德此才，竟赍志以没。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大理喜洲是张耀曾的祖籍。1944年7月，郑



张耀曾

天挺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等先生一起前往大理实地考察，历时34天。郑天挺在大理不仅实地调查收集资料，还前往拜访了大理喜洲的张耀曾之亲属：8月5日，“唔赵冠三，保直士也，年已七十一，为西大哥之表叔，谈及宽熙二哥”；9日，在林之棠的引导下，和徐梦麟一起前往拜访了张耀曾的两位堂兄，“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身体甚佳，耳目聪明，背挺如天，步履如飞”；8月6日下午还和同事一起前往游览张耀曾家祠——张公祠。可见在张耀曾病逝后，郑天挺对他的怀念之情。

三、坎坷的家庭生活

1921年8月，郑天挺在北京与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的周稚眉结婚，此后在福建、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11月随蒋梦麟回北大，才算过上较为稳定的生活。可惜1937年2月27日，周稚眉因手术失败辞世，留下五个年幼的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郑天挺毫无思想准备，悲痛万分，每天除了按时上下班，回家以后

就一个人进入书房念佛，怀念妻子。在日记里，郑天挺对于父、母、妻子的生日、祭日，每次都登记。其对妻子的思念，触处皆是。看到梅花，会想起夫人的名字；吃到扬州风味，会想起夫人之手艺；喝酒打牌过了头，会想起夫人之告诫；听闻其他女眷吵架，就忆及夫人之处世原则……

1942年2月21日：“今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五周年忌日……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昨夜偶忆五年前夫人入医院情形，其悔痛又不止泫然也。”

1937年春节妻子去世时，郑天挺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秘书长。那时蒋梦麟校长经常不在北平，学校的行政工作全由其一人承担。没多久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11月17日，他强忍悲痛，将子女交给弟弟郑庆珏抚养，临行前嘱托：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就这样，他与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南下，暂驻足长沙，后辗转到昆明。几个孩子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其过去存的股票以及他定期给的生活费，由郑庆珏统一管理。郑天挺与周稚眉共有五个孩子，学名依次为：郑雯、郑晏、郑克昌、郑克晟、郑克易（后改为扬）。1937年春天，两个儿子，老四克晟（6岁）老五克易（3岁）均患病，而且是患有“儿童杀手”之称的猩红热。所幸北平有着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老二郑晏又能干，两个孩子均脱离危险且无后遗症。在郑天挺的日记中，除了对妻子的思念外，对五个孩子的挂念，更是随处可见。遇到每个孩子的生日，



周稚眉与五个孩子

日记都有记录。其有两句诗，“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先后提到三次。1946年7月7日：“余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

1942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配给的粮食也不能保证了，市民开始挣扎在饥饿线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3—5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2天，最后一人供应2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郑天挺的孩子们在沦陷区依靠可怜的一点混合面生活。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腐渣、仓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其实，郑天挺在昆明也是在警报声中教学与生活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资源匮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依然清贫并坚守着。“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规定，公务员工资一律按八折支付。郑

天挺的工资也缩减了20%，这既要维持自己在昆明的开支，还要负担北平五个孩子的生活费与渐涨的学费，经常是捉襟见肘。而且郑天挺决心与北大师生同甘共苦，不领任何津贴补助。为了专心钻研学问，他坚决不到校外兼职，实在困难就变卖自己的字画，刻印图章，写文章，去电台演讲等赚些小钱，每个月的收入比战前强不了多少。

1943年，郑先生长女郑雯不愿待在沦陷区，执意前往大后方投奔父亲。辗转3个月，8月14日抵滇，与父亲不期而遇，“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此时父女别离已近6年。郑雯由伪北大西洋文学系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郑先生对她的关心，流露在后来日记的笔墨之间，让后人读后都感到非常温暖。1945年9月3日，郑先生为北大复员事先行北上，留郑雯在昆明继续读书。

1946年，郑雯自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郑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截止到1946年7月14日：“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相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余，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儿以六月十日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

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而一年前的1945年8月20日，郑先生日记写道：“饭毕，偕雯儿还舍，谈考试及回家事。”1946年7月6日：“雯、晏两儿生日，上供。雯在沪，未及还，殊念之。”回家，回家。如今家还在，人却回不来了。这种锥心之痛，比起9年前的丧妻之痛，更是绝望！大女儿郑雯空难而逝，时年23岁。

其实，一年前的春天，郑天挺刚刚经历过一次痛失手足之痛。郑天挺的弟弟郑庆珏，日记中所称的“三弟”，于1945年清明逝世，享年41岁。但是郑天挺却是半年后才得知。1945年10月4日，郑先生早膳时谈及家事，三表姐张佩芬屡屡支吾其词，最后只能以实相告：三弟实已过世。郑先生当即惊骇泪下，竟日未出。日记1938年8月31日载：郑天挺与章廷谦闲聊，得知章有家书，“谓三弟患咯血，为之大惊，家书中从未言及，不知何故，岂讳之耶？”原来郑庆珏早已患病，只是没有告知家人而已。

郑先生此后的日子如何，心境如何，我们很难知道。他内心有种一切以学业为重、绝不能以家事干扰事业之意志，故其内心之痛苦，是他人无从感觉得到的。但长女郑雯之丧，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直到1951年6月9日，郑先生才重开日记的写作，引首专门题一句，曰：“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梭，新生请自今始”。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与子女在卢沟桥合影

所谓“新生”，是对此前五年痛苦心路最为贴切的写照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郑天挺在天津孤独地生活了十年，当时天津还不是直辖市，仅是河北省会，其经济发展与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生活条件差距更大。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北京没有福建特产卖，其次女郑晏夫妇俩就托同事从福州买来红糟料和燕皮，做好成品带给郑天挺。南开大学希望郑天挺在北京工作的某个子女能够调到天津，照顾他的生活，并解决户口与工作。1963年，二儿子郑克晟教授全家调往天津。1966年6月“文革”开始，郑天挺遭到批判，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郑克晟全家也受到牵连，1969年下放到天津西郊插队，1973年落实政策后才回到南开。

四、学术教育报国

虽然家庭生活坎坷，但郑天挺先生坚毅顽

强，以“及时行人”自警，为国家危难时期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天挺早年在北大十分敬佩李大钊的道德文章，曾亲自为之下葬。1933年，经文学院院长胡适和其他几名教授推荐，郑天挺出任北大秘书长。当时郑为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方才辞掉这一职务。他热爱学生，抗战前夕，积极支持爱国抗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营救“一二·九”运动学生。1940年，他虽想专心学术不愿再干行政工作，无奈于梅贻琦等校领导坚持而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要处理三校间的矛盾和各种杂务，但他仍坚持按时给学生上课，一人身兼学堂行政、科研、教学，取得卓著成果。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感慨他“既以学术研究为人生理想，同时又把行政组织工作看作是践行其学术理想的举措”。

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与同乡邵循正、陈岱孙、冰心、施嘉炀等远足郊游，探讨学问，也与罗常培、蒋梦麟、梅贻琦、陈寅恪、汤用彤、姚从吾、钱穆、邓广铭、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在日常生活中，郑天挺为人谦虚，真诚待友，忠爱于家，尊师爱生，克己奉公，表现出高尚的为人品行。并且郑天挺一直坚守着学术传统，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具有坚定的抗日战争必胜信念，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彰显了在国难中的坚忍与担当。北平解放前夕，北大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的名义送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以表达对其二十几年保护学校运转丰功的敬佩之情。

船政匠首黄文禧

——一份船政奖札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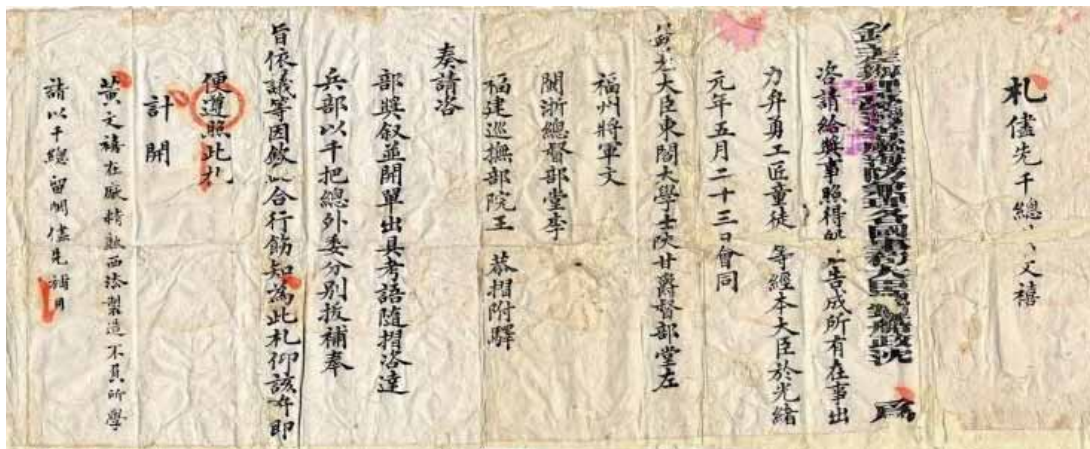
黄淑贞

最早接触到永泰历史文书，是2014年在锦安村驻村工作期间见到的一份奖札。所谓奖札，那是旧时发给有劳绩官员的一种奖状，形如札子，内叙受奖人的工作成绩，并可授以虚衔或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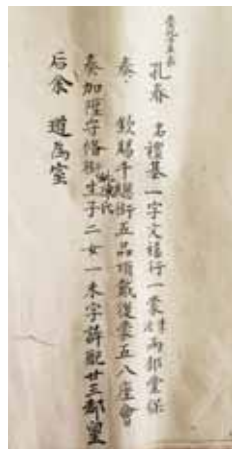
在那份奖札上，船政大臣沈葆楨、陕甘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和福建巡抚王凯泰等五大官员，联合向朝廷上书举荐黄

文禧：“黄文禧在厂精熟西法制造，不负所学，请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奖札颁发于光绪元年（1875），文中“千总”为正五品。2009年，永泰县在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黄家的三件文物，这份奖札即其中之一，另外两件分别为黄文禧用过的木柄短剑和拐杖。该奖札长64厘米，宽25厘米，系三级文物。

锦安《黄氏族谱》记载，黄文禧，谱名黄孔



陈列于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奖札



锦安《黄氏族谱》上关于黄文禧的记载

春，别号珩臣，又名黄礼基，道光八年（1828）三月十六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霞拔乡锦安村。他家共有兄弟5个，黄文禧是家中长子，妻陈氏为其生育两子一女。

2010年3月23日，黄文禧的后人黄行坚和黄仁洪将这三件文物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其中请奖奏片现陈列于船政文化博物馆二楼展厅，其他两件在一楼大厅的电子屏也可查到。

锦安村部分黄氏族人认为，黄文禧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艘战舰“万年清”号中国籍总设计师。现有网络资料也多沿用此说法。然而，笔者根据走访查阅到的相关史料，产生了一些疑问。

首先，史料记载船政艺圃招收对象多为15—18岁的徒工。1866年，时年已38岁、粗通文墨的黄文禧是否还有心力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英文、法文以及那些精密的近现代西方造船专业技术知识？若不事先学习这些知识，黄文禧何以能参加“万年清”号等舰船的设计制造？

其次，船政建立之初，当局招收的中国工人多为生活不宽裕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已有一定行业身份地位的建筑工匠黄文禧又是如何进入船政的？

再则，1879年，时年51岁的黄文禧被提拔为版筑所“匠首”之一，版筑所具体负责船政哪方面的职能？

在锦安村无法寻觅到确切答案，笔者只好将希望寄托于锦安村11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船政博物馆，借此寻找更多事实依据。笔者能查到的永

泰籍船政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以身殉国的“超勇”号管带黄建勋，另外一个就是船政工匠黄文禧。

“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史料记载，沈葆楨创办船政局初期，对人员的考核十分重视。他说：“始固因事而任人，今则因人而考绩，苟有所效，虽小善不敢没……虽所亲不取滥。”这就是“保奖制”初始原则。

1874年，外国人员完成了合同所规定任务，经沈葆楨上奏，准予兑现合同规定的奖励“加奖两监督各银二万四千两，加奖外国员匠六万两”。也就是说，给外籍监工或者工人的奖励主要是金钱。

1875年，黄文禧获奖的这一期，也是船政局本国人员第一次受奖，受奖人员包括在厂员绅、



黄文禧故居

学生和在船的管驾、管轮，总计 237 名。奖励办法主要是晋级，或外放补用实职，赏给“功牌”，这是一种政治荣誉。黄文禧故居的“大夫第”牌匾（原件丢失，现悬挂的为复制品）很可能是这时候授予的。

据锦安村老一辈人口述，黄文禧非常敬重他的父亲。作为家中长子，他从小跟随父亲在一个个工地上流转，吃百家饭长大，耳濡目染间不仅练就了一身筑墙的好本事，也把父亲严谨做事、宽厚待人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青年时期的黄文禧，业务范围多在福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福州即为其中之一，口岸对外贸易往来繁荣，外国人的建筑需求倍增。

这期间，黄文禧的版筑技艺日益精湛，他充分发挥夯土材料就地取材、简便易得的特性，钻研出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夯土配比，赢得雇主们

一致好评。

为了减少雨季对夯土材料的影响，筑墙环节一般安排在干燥少雨的秋季，以利于新杵墙体的干化；一层干化，再继续往上杵上一层，确保墙体密实不开裂。如此循环，依次而上，直至墙体全部完工后，举行“下斛”仪式，筑墙工序就竣工大吉了。

黄文禧还擅长根据房屋面积、高度以及布局等，计算墙面的版数和所需土方，预估工期和所需钱粮，使得整个营造团队各个工序之间的管理与协调更加紧凑，从而大大节省工期和钱粮。

鸦片战争后，巩固海防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战略举措。在这种背景下，修筑海防、加固城墙也成为朝廷的首要任务。黄文禧因为手艺精湛，经常被举荐参与官方土建项目的营造。

如，在为马尾造城墙期间，黄文禧根据当地靠海、多台风、强降水多的特点，将墙体筑得又厚又结实，县令巡检时非常满意，最后以双面测量价格付给他工钱，还竭力将其举荐到船政基地。

船政营建初期，沈葆楨从左宗棠手中接任船政时，面对朝廷保守势力和英法势力双重夹击的同时，在工程推进中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

在这种背景下，如黄文禧这般人品端方、建筑经验丰富又懂材料管理的匠人就显得尤为重要。截至 1868 年，黄文禧加入船政基建的第三年，船政局基地陆续建成“船政十三厂”，为舰船制造搭建起了初具规模的船政机器厂。

船政的生产部门俗称“十三厂”，由办公所



悬挂在黄文禧故居的“大夫第”牌匾



船政工程师、工匠在轮机车间门外的合影

统一管理，下辖各“厂”“所”“院”“营”等单位，是中国第一个以完整西方模式构成的现代工厂车间体系。中国船政博物馆二楼，可见《船政生产部门主要机构一览（1874年）》，中间第二行清楚标明了黄文禧所在的“版筑所”是土建施工队。

1879年，李鸿章称：今海防吃紧，所有各省兵轮船管驾及船政制造等局监工需材孔急，非先于学徒中加意培植不可……从而先后提拔了一批匠首，《福州船厂》的匠首名单里，版筑车间匠首黄文禧赫然在其中。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前面的三个问题。毋庸置疑，黄文禧在船政的确切身份应该是版筑师傅，而非舰船总设计师。

1881年船政在三岐山脚修建粤东山庄，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后，在马限山东南修筑昭忠祠。不难推测，黄文禧从1866年开始到1884年在船政基地近20年职业生涯中，一直勤勤恳恳，半点

不敢马虎，他深知船政基地这个国家工程，对海防吃紧的朝廷意味着什么。

黄文禧还打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手艺轻易不外传的旧俗，在工作中不吝于培养后继人才。最终因能力突出，他被朝廷擢升为船政基地版筑所的匠首、把总、千总乃至守备。

1884年后，黄文禧因朝廷继任管理者的昏聩无能，心灰意冷辞官归乡，并一再拒绝复出，直到1897年去世。

根据永泰大洋建筑前辈介绍，许多永泰工匠陆陆续续参与过船政基建，只是史料有限，除了少数佼佼者或者匠首留下些许史料，多数人都默默无闻。

目前能查询到的永泰基建人物（或单位），除了黄文禧外，便是永泰《大洋镇志》提及的永泰人创办的“中美甲等营造厂”，其承建的马尾造船厂工业烟囱，是当时船政基地内最高的地面建筑。

可惜的是，今日船政基地内，夯土建筑在百年岁月洗礼中早已难觅踪影。只有流传下来的奖札，诉说着黄文禧辉煌的过往。而船政基地之所以选择马尾，也是看中了永泰大山深处丰富的木材资源。蜿蜒曲折的大樟溪，放排汉子闯滩进城，把木料带出深山，永泰工匠也把精湛的营造技艺带出大山，走向省城，成就了永泰建筑之乡的美誉。

据村里老人介绍，旧时家庭，子嗣养成，有条件的读私塾走科考仕途，条件一般的则让其早

早学徒，以手艺谋生。黄文禧比其他男孩要幸运一些，他跟随的师傅即自己的父亲，避免了很多师徒传承中的打骂和留一手的“藏技”。

也许，正因长年累月跟随父亲的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父辈的艰辛，愈加敬重孝顺父亲。据村人介绍，黄文禧父亲崇化公爱吃海鱼，黄文禧便经常自己吃糠咽菜，节省下生活费用于购买新鲜海鱼，以盐腌存，每个月带回家给父亲吃。常年如此，直至父亲去世。

晚年黄文禧归乡时，心中仍是最惦念其父，看到父母的坟莹年久失修，便亲力亲为筑墙修墓。据锦安村人介绍，如今150多年过去，黄文禧父亲崇化公之墓四周墙体依然完好无损，足见其技术精湛。

旧时村人修墓立碑往往注重择吉、选址，黄

文禧却不请风水先生，不定时辰，但凡乡亲邻里有意见，或不利于他人之处，他尽皆避开。直至完成墓地修缮，未与村人邻舍发生一次口角。

1897年，黄文禧在七十高龄去世，因家中清贫，家人无法自理丧葬费，族人纷纷慷慨解囊，助其顺利下葬，也可见他在族人中受尊重的程度。

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本文考据到的结果——黄文禧只是一名版筑匠首，但是他对船政基地建设的贡献依然不可埋没。

欣闻霞拔乡锦安村除了为黄文禧塑像外，未来也将筹建博物馆，全面讲述黄文禧与船政的故事，希望以博物馆为纽带，打通古今、穿越时空，将老一辈奋力拼搏的过往，通过故事传递给下一代。同时本文借此抛砖引玉，希望获得更多关于船政工匠黄文禧的史料线索。



黄文禧雕像



永泰锦安黄氏宗祠

郭沫若与福州工艺之缘

张 斌

我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1892—1978）与福建因缘情深，他对闽都福州人文风光和传统工艺美术有特别的感情，我们可以从他的相关诗作领略到其间的缘由。

一、两处手书题刻

所谓题刻，即将题字墨迹摹刻于石头上，通常有石碑刻字和摩崖石刻，即在野外天然山石上凿刻题字。福州的郭沫若手书题刻形式两者都有。一处是在鼓山灵源洞摩崖石刻群的石门上，另一处在台江区宁化支路1号门柱上，分别于郭老辞世后的1979年、1980年所勒石。

鼓山景区的郭沫若诗词题刻由时任福建日报社美术摄影处负责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后任省美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的丁仃先生（1933—1998）担任艺术指导，福州雕刻厂三位技术人员施工。

郭沫若游鼓山咏诗题刻在灵源洞石门岩壁上，崖面平展如砥，石面高136厘米，宽71厘米，阴刻字径11厘米，行草书字迹清晰，描红



郭沫若手书“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勒石

漆。全文为：

节届重阳日，我来访涌泉。清风鸣地籁，微雨湿山川。

浮岭多松柏，依崖有杜鹃。考亭遗址在，人迹却萧然。

十一月八日访涌泉寺 郭沫若

诗中落款的1963年11月8日是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属立冬节气，重阳节已过了十多天，郭老雅兴题为重阳节，乃因应了古人重阳节登高望远抒情赋诗的悠久传统。



灵源洞石门岩壁上的郭沫若题刻

郭老的这首诗，是对鼓山松涛鸟鸣，清风幽静，云雾缥缈，似凡间仙境的咏叹。诗的内容与福州工艺无关，但诗刻雕工是福州雕刻厂选派的人员，他们驻鼓山近一年，艰辛摹刻题诗，也是该段历史的因缘者。笔者曾受参与刻石的王贞魁同学邀请上鼓山，亲睹诗刻现场，观赏到郭老生前留下的四尺全开宣纸上的题诗墨宝原件。郭老书法主要取自宋代米芾，又具个人风格，行笔飞动，浑朴苍劲，具有非常强的视觉张力。

摹刻郭老题诗，非常不易，当时没有今天普遍使用的电动刀具，也没有复印机可复制郭老手书样稿，只能用透明拷贝纸双勾字形，再以复写纸拓描到岩壁后凿刻。由于鼓山多云雾笼罩，岩石表面常因潮湿不易拷摹字迹，只能在晴朗的日子抓紧时间施工。他们手抡铁锤无数次反复击打合金铁鏊，一刀一刀地把描摹的诗句用全手工刻

制出来。郭老这首 50 多个字、字径 11 厘米的诗句，刻工花了近一年时间，耗用了许多铁鏊和纱布手套。

如果说鼓山郭沫若诗刻与福州工艺的关联传达的只是间接因缘讯息，那么郭沫若手书的“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刻石，则是郭老与福州工艺界直接情缘的体现。在台江义洲宁化支路 1 号门墩上的这幅大理石题刻，通高 150 厘米，宽 30 厘米，每个阴刻字径高约 13 厘米，亦是贴福州金箔，历经风雨 43 年，镏金光彩依然。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虽已改制停办，但门墩上的这幅题刻与郭沫若生前留下的多首赞美福州工艺的诗词，至今仍传为历史的佳话。

二、诗赞福州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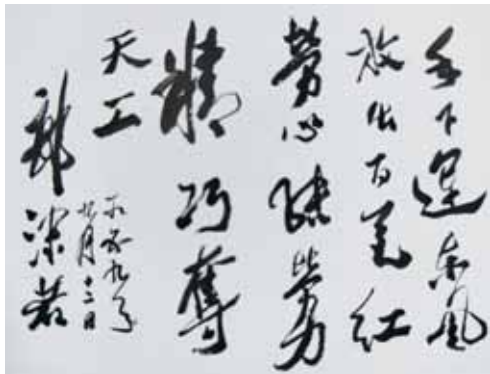
郭沫若生前多次赋诗题赞八闽工艺美术。从已收集到的史料看，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郭沫若在京参观福建工艺品展览，或来福州造访脱胎漆器厂、石雕工艺厂时题写了多首诗词。现按诗作时间先后编号录入，略说其成诗背景。

(一)

手下运东风，放出百花红；

劳心结劳力，精巧夺天工。

郭沫若这首诗题于 1959 年 9 月 12 日，在北京北海公园西侧团城参观了福建省工艺美术展览后，应展会方求赐墨宝，在接待室现场提笔挥就。这次展会上展出了福建著名的福州脱胎漆



1959年，郭沫若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展览题诗

器、寿山石雕、软木画、龙眼木雕和德化瓷器、泉州木偶头等 1800 多件展品。郭老与夫人于立群整整半天驻足展馆内观赏，对福州脱胎漆器和寿山石雕特别喜欢。看到漆盘上金鱼若隐若现生动逼真，于立群对郭老说，家里书房的砚台盖如能画上漆画金鱼图该多好。当时陪同参观的展会人员、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林荫煊（1924—2000），在郭老夫妇参观结束离开展馆时，对于立群说：“您喜欢漆画金鱼装饰大砚盖，可派人寄来，我们有一班人马正在人民大会堂装饰福建厅，有专人会描漆画金鱼的，请即便交来照办是了。”过了数日，郭老的秘书王庭芳将砚盖送来了，不到半个月时间，由在京参加人大会议福建厅装饰的福州工艺美术学校首届漆艺科毕业生郑益坤，画好了砚盖上的游水金鱼，活灵活现又深沉含蓄。郭老夫妇很是赞赏。

（二）

八十六种，齐放百花；
春来手下，看遍天涯。

这是郭沫若 1961 年夏天在北京团城上，再次参观福建工艺美术展览后，现场留下的墨宝。

（三）

漆从西蜀来，胎自福州脱。
精巧叹加工，玲珑生万物。
或细等毫芒，或巨逾丘壑。
举之一羽轻，视之九鼎兀。
繁华着手春，硕果随意悦。
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
勿以地为牢，精进不可辍。
日新又日新，时空两超越。

郭沫若这首赞美福州脱胎漆器的诗流传很广。1962 年底郭老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来福建考察，到福州的第二天，就到了当时位于台江义洲宁化路的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在车间里看到老艺人以布质脱胎工艺，仿制成出土的殷商时期的青铜司母戊大鼎，相似度极高，连斑驳铜锈也仿制如旧，真假难辨，叹为观止。郭老建议厂方邀请故宫博物院和大连博物馆来订购这轻巧的脱胎仿青铜复制品，说一定会得到好评。在厂陈列室仔细观赏后，他即热情洋溢挥毫题诗赞美福州脱胎漆器。后来许多介绍福州工艺品的书籍，或研究传统漆艺的专著，常会引用此诗词。该诗以细腻又夸张的华彩文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福州脱胎漆器造型丰富优美，质地轻巧奇特，工艺天下无双。

（四）

八闽是我故乡，去年我曾去来。

工艺允称精绝，一年一度花开。

这是1963年2月1日上午，郭沫若夫妇在北京团城第三次参观福州工艺美术展所题的诗。这天恰是大年三十，北京天气寒冷，大雪纷飞，郭老夫妇身穿大衣，头戴呢帽，脚穿棉鞋来到展会。在展示现场，又一次兴致满满地欣赏琳琅满目的福州寿山石雕、脱胎漆器等工艺品，并与接待人员回忆说：“两三个月前刚去过福建，在榕城参观了脱胎漆器厂、石雕厂，对福州特艺印象好极了。”还说：“寿山石最名贵的算是田黄石，石色有枇杷黄、橘皮黄、栗子黄等多种，有通灵澄澈的，称为田黄冻，田黄石还有萝卜纹的，都算上品。”又说，这些常识，是参观石雕厂时一位叫林友琛的老艺人告诉他的，足见他对福州工艺难以忘怀。参观完题诗后，郭沫若在接待室告诉展会的福州工作人员，他的祖先是福建汀州宁化的。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的祖籍汀州府宁化县，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后裔。郭老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



郭沫若1963年底在福州石雕工艺厂参观

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所以郭老这次题诗首句便是“八闽是我故乡”，他对故乡的精绝工艺引为骄傲，称之为“一年一度”常开不败的鲜花。

（五）

团城又是一年春，闽艺展陈色色新。

连岁东风吹不断，百花齐放竞推陈。

这是郭沫若继团城展会上的诗作之后，又在他家中所题写的诗句，同时还手书“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于1963年2月4日即农历春节初三上午，带上这两幅墨宝，携夫人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郭世英、郭民英一同来到了团城福州工艺展会。郭老将两幅手书交给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林荫焯，高兴地说道：“大年初一，我开笔写这幅字（指诗作），又写‘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题字，现在都送来了，给你们做纪念吧！”前文讲到的台江义洲宁化支路1号郭沫若题刻，即这幅手书的勒石，巧得很，这题刻所在的地名叫“宁化”，竟与郭老的祖籍地同名。

近日，我曾经的美术学校班主任，88岁的著名漆画家郑崇尧老师，在南后街黄巷工作室向我展示了一张1959年底他与同学郑益坤等在北京与郭沫若夫妇的合影旧照，参加留影的为首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装饰的福州工艺美术学校首届漆艺科毕业生、福州工艺局与工艺研究所负责人。想必，这旧照片后面，还有郭沫若与福州工艺美术的故事待追记。

站在乌山邻霄台上下求索，你会发现，3000年前中国人的原初信仰，从江山社稷到州县郡社，最后能把土地神力长久保存的，还是最普通的百姓人家。

社神在福州

大 路

一、社神来找蔡襄

蔡襄回福州担任一把手，第一次是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小蔡当年三十出头，笔墨漂亮，交游广阔，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这位闽籍名臣一向故事多多，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就写了这么一个奇异故事。

蔡君谔作福守日，有一书生投诗来谒，云：

远入青青叠叠峰，峰前真宰读书宫。
半岩冷落高宗雨，一枕凄凉吉甫风。
烟锁豹眠闲雾露，井凋凤宿旧梧桐。
九龙山下英雄气，尽属君家世胄中。

这位书生不请而来，匆匆投诗探访蔡襄，却不留姓名就走，貌似有点无礼。

可是光看这首七律，中间二联对得工整，字里行间感慨沧桑，显是见过不少世面。结尾两句表达了对主人的欣赏友善，又似乎全无恶意。

他是谁？为什么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

故事里说，蔡襄也和我们一样好奇，“君谔异之，寻令人伺其所归。”派去跟踪的人发现了什么秘密呢？

蔡襄收到的报告是：“至一山下忽不见，四顾无人，唯一社屋尔，意其社神也。”

社神是什么神？

二、中国人的原始信仰

在商殷甲骨文里，社写作“土”；社神，就是土地神。

3000年前的古文字，记录了中国人祖先最初的信仰：天，地。

天是无穷的宇宙，而脚下广袤的大地，是宇宙与人类生生不息的连接。敬天、拜地，乃是人与宇宙沟通的方式。在佛教东来、道教生长之前，天地，是我们祖先的原始信仰。

1950年发掘的郑州商城遗址、1959年发掘的江苏铜山丘湾遗址、2014年发掘的陕西周原遗址，都有上古遗存的社祀建筑。

3000年前中原祭祀的社神，是怎样穿越时空，来到东海之滨的福州？

也许，可以追溯到神话。

中国神话中最有神力的土地，是大禹治水传说用过的“息壤”，一块能自行生长的土地，帮助人类制止了洪水。《山海经》记载，“帝乃命禹率布土九州”——镇住洪水之后的大禹，按土地分布划定华夏九州的疆域，建立了第一个王朝。

社，因此成为立国的象征。

在上古夏商周三代，历朝上位的天子，都要

建最高规格的社稷坛（太社），祭祀土地大神及附属的稷（农）神，以此表明自己拥有国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社稷”一词指代的就是国家。

社稷信仰，即国家信仰。

3000年朝代更迭，社稷坛成为国家政权演绎的重要舞台，直至清亡。现今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北侧中山公园内，仍有清代遗存的社稷坛建筑群。它们和上述考古遗存，都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社稷坛的陈设随时可以参观：主坛上铺陈各地进贡的五色土：东为青土、西为白土、南为红土、北为黑土，中间则是黄土——意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坛中央原有一方形



北京中山公园里的社稷坛

石柱，名“江山石”，意为“江山永固、社稷长存”。

而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社会”“社区”“社群”“公社”……这些活跃的语言，提醒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信仰，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

宋人笔记里的社神故事，虽属虚构，细想却也有趣：社神可以直接出入福州地方政府机构，与福州政府最高长官有来有往。

福州的社神，是从几时起，得到官方认证呢？

三、社神的级别

在周礼中，社的规格，按照拥有的国土大小，分级祭祀。

《礼记》说“家主中霤而国主社”，最小的就是“中霤”，是有土地力量的家神，只管一处家宅。“中霤”这个词的本义，是各家屋顶正中用来透气透光的洞。人们把中霤的主位安放在洞下的位置，接受天上的雨露风霜，因而得到土地的保护和力量。

比家庭高一级的单位叫作“里”，一“里”的标准是25户，25户人家集体立社，就叫里社；里社属于“民社”，祭祀社神的钱，大伙儿一起掏腰包出份子钱。

在周代，里之上为“州”，2500户人家为一州。《周礼·地官·州长》规定州长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以岁时祭祀州社”。到这个级别祭祀社

神，就可以动用公款了。

州之上，就是诸侯国；诸侯之上，是掌有全部土地和人民的“天子”。社神的行政级别，也随之提升。

《礼记·祭法》记载：

1. 王为群姓立社，曰大（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
2. 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
3.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王（天子）拥有的土地最广大，可以举国之力，为社神筑造大型公共露天平台，用以祭祀和祈祷，即大（太）社。这就是“国主社”。

——诸侯分封最重要的仪式，是天子交付给诸侯一块白茅包裹的土，作为分封权力的象征。诸侯因此可以拥有国社与侯社，但规模只许是太社与王社的一半。

祭祀也讲等级：天子可以祭天地，诸侯只能祭山川，小民除了拜拜自家的中霤，最多只能去里社祭社神，不许僭越。

所以社神的主要行政等级就是：（天子）太社——（诸侯）国社——（州长）州社——（25户）里社——（小民）中霤。

至于大夫，他们不具有独立的政权，因此不能单独立社，只能“AA制”，大伙儿凑置一社。通常来说，规模要比里社大。这大概是西周等级秩序的弹性处置。

到汉以后，郡县加入社祭的“行政圈”。之

后每一个朝代，几乎都由礼部来多次拟定太社、州社、里社的祭祀法则。

在福州，行政级别最高的社稷坛，当然是州社。

四、社神在福州

社神在福州，早年的待遇不太好。

现存最早的方志、南宋淳熙《三山志》，在卷八“社稷坛”条下，记录了福州的社神传说：“古社稷坛，州南七里，并城以西地污湿。遇祭报，趣戒闽、侯官县吏办治。”

“古”字说得含糊，不知道具体年代，但因为下文提到唐朝后期，这个古字，也许是统指晚唐以前。

地点，大概在州城外西南方向。晚唐诗人杜荀鹤（约846—约904）《闽中秋思》写福州城“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说明福州城南依然“畔海”；诗人陈翊《登城楼作》写福州“沙

墟阴欲暮”，沙墟是荒废的沙地——唐代海退未远，福州南郊尚未变成坚硬的陆地，因此“地污湿”，潮湿脏乱，社坛环境很差。

这时的长官，对社祭看来也不在意。福州天高皇帝远，每逢祭祀社神，州官自己不去，推给闽县和侯官县，县令也跟着偷懒，打发一两个办事员“赶紧去料理一下”。

其实大唐朝廷并非不重视社祭。唐高祖李渊，以鲜卑入主中原，却也奉社稷之祀为正统，立朝不久，便颁布《立社诏》，指出社祀的意义和功用：

厚地载物，社主其祭，嘉谷养民，稷惟元祀。列圣垂范，昔王通训，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暨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敦序教义，整齐风俗……（《全唐文》）

重视州社的长官叫杨发，这个名字出现时，已是晚唐。

“唐大中十年，观察使杨发始迁于其西，今



南涧寺之东，为社稷及风雨师坛四。”

唐大中十年，即856年。杨发结束苏州刺史的任职，来担任福建观察使、福州刺史。社祀是头等重要的文化建设，杨发立刻抓紧推动这项工作。

那时候，李唐朝廷早已颁发过包含社祀内容的《大唐开元礼》，此次迁建社稷坛，依据的是天宝四载（745）和天宝五载（746）的相关补充诏令“风伯坛置社之东，雨师坛置社之西，各稍北三数十步，卑小于社坛”“遇祭雨师，宜以雷师同坛，共牲，别置祭器”。

也就是除了原有的社、稷两坛，东北面、西北面分别增设了规格较小的风伯坛和雨师坛，一共四个祭坛。社坛祭土地大神，稷坛祭农神，附祀风雨雷电，专门祭雨的时候，要连雷神一起拜拜。

社稷坛的地点，选在南涧寺之东。

南涧寺今已不存，但清人郭柏苍《乌石山志》中有南涧寺的下落：

1. 南涧报国寺，今称南涧寺，在山之东。
2. 南涧寺，“自元以来，以寺旁之地祀疫神。”
3. 净光塔，俗呼石塔，在南涧寺东，五代晋天福六年（941），王延曦重建，名崇妙保圣坚牢塔。

我们再从中拎几个关键词出来查找：

“在山之东”——也就是现今的乌山东面。

“寺旁之地祀疫神”——这个线索比较明显，乌山上的高爷庙。高爷庙里陈列的清代香炉

还有“南涧”的字样，也许是隔壁南涧寺搬过去的。

“净光塔”——也就是今天的乌塔呀。乌塔既然在南涧寺东，那么，杨发迁建的社稷坛，应该是和乌塔平行。

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定位社稷坛了。来看《三山志》中对杨发版社稷坛的描述：

广狭高下有制度，斋庐皆具，周回三十有九丈七尺，缭以崇墉，为门东向，其外辟二室，南立双表。

看起来，是按官定标准建的社稷坛，周围有高达丈六的围墙，大门朝东，南面立着两个华表，还有斋祀的庐舍。一唐尺合今天的0.247—0.313米，读者可以自行计算社稷坛的占地大小。

既成，命摄巡官濮阳亓（qí）为之《记》，以防改易。

看来，杨发对社稷坛工程还是比较满意的，完工以后还要求记录成文。这篇文章叫作《闽迁新社记》，是现在研究州县社稷制度一篇非常重要



乌山高爷庙遗存的“南涧”字样香炉

的史料。写成后，用隶书刻碑。这块碑，至少在《三山志》成书的时候还在。

按这篇文章记载，刚刚结束苏州刺史任职的杨发，巡查到福州社稷坛的荒凉情形，很不满意，说苏州的社稷坛做得好好的，怎么福州的社稷坛就不成样子呢？

一把手重视了，事情做起来就很快，工程从当年的六月出计划，十一月完工。全部费用不到十万钱，而且也没有向民间征发劳力、征收工程款。建筑风格“爽洁开拓”，四个社稷坛也做得工致。

值得注意的是，杨发版的社稷坛供奉的社主，仍为石质。而按《五经要义》所说，“社必树之以木”，社坛周围必须栽种社木，《周礼》说选社树的原则是“各以土地所生”，即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树木。杨发在福州，选的当然是福州特色的榕树，一共是20棵大榕树。

唐代的福州社神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杨发版的福州社稷坛用了该有50年。因为李唐亡国，是在907年。《三山志》叙述：

伪闽时，以其地为佛祠，而迁坛于乌石山之阴。

也就是说，到五代闽国时期，福州社稷坛又迁建了一次，地址在乌山北面，具体不详。

五、乌山邻露台：宋代社稷坛

来见蔡襄的，当然是北宋的福州社神。

如果以时代投射的角度来观察，宋人笔记中虚拟的这位社神形象，也正是后世人们对宋代福州的看法——一位骄傲潇洒、“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书生。因为那时的福州，早就是“路逢十客九青衿”“巷南巷北读书声”的斯文盛世了。

但是，书生诗句中那淡淡的沧桑又来自哪里？

我们在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找到了答案：

真宗景德四年，户部员外郎、判太常礼院言：天下祭社稷、释奠，长吏多不亲行事，及阙三献之礼，甚非为民祈福、尊师设教之意。望令礼官申明旧典。诏付有司。

——礼部官员为州县社祭问题向皇帝告状。北宋景德四年，是1007年，当时社祭通用的制度，早已有宋太祖在位时诏定的《开宝通礼》。可是礼部还是发现了：

很多州官在偷懒！（“长吏多不亲行事”）

为什么宋初和唐代的很多州官都逃避社祭呢？

说真的，社祭的事，挺累。虽说“春祈秋报”，一年州县基本社祭不过两次，但每次都很折腾。比如《大唐开元礼》规定，社祭“前三日，刺史（县则县令）散斋于别寝二日，致斋于厅事一日”。

祭祀前，州县长官就要斋戒。那三天必须沐浴更衣，不可以喝醉，不可以吃肉吃荤，不可以吊丧问病，不可以淫邪玩乐……要打坐静思，洁

净身心，以便在祭祀时可以心灵通神。斋戒的生活那么无趣，以致唐朝刺史们纷纷偷懒。

而北宋的《开宝通礼》，本来大部分就是抄《大唐开元礼》，难怪宋代各地知州也要溜号。

那么，社神见完蔡襄会怎样？正史中未有蔡襄和社祭的记录，不过，北宋朝廷有关礼仪祭祀的讨论记录，好几次闪过福建人的身影，其中不乏蔡襄的朋友。

福建浦城人吴育，景祐四年（1037）向宋仁宗进言：“今礼院所藏礼文故事，未经刊修，而类例不一，请择儒臣与本院官，约古今制度，参定为一代之法。”是吴育要求再次开展礼院所藏礼文资料的编纂工作，这才有了庆历四年（1044）完成的《太常新礼》40卷。吴育是礼部官员，后来当了参知政事（即宰相）。

比如《宋史》卷九十八 / 志第五十一：

熙宁十年……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

与礼官讲求以闻。

元丰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

——熙宁十年（1077）提出问题的谏官黄履，是福建邵武人。

——元丰元年（1078）被派去拟定礼仪规范的陈襄，是福州学者天团“海滨四先生”成员，他是蔡襄的好朋友。

还有苏颂，闽南人，那位发明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编写《本草图经》，后来做到宰相的大科学家，很少人知道在元丰年间，他也“知太常礼院”，曾经上疏奏请全面修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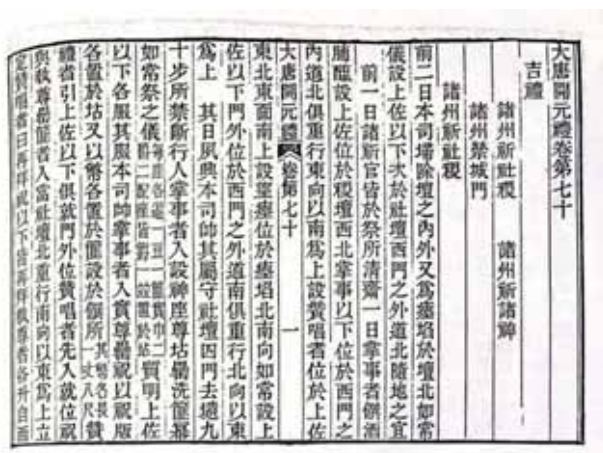
制定法规是国家上层的事情，落实到地方，还靠州县长官。我们来看《三山志》中把社祭工作做得可圈可点的官员：

皇朝元祐六年，柯龙图述辟而新之，建斋厅。

这个事情，当事人柯述（1017—1111）自己有记录。

元祐六年（1091），75岁高龄的泉州人柯述，花费了大半年时间，组织人力，因地制宜，按照古制，把社坛建在了乌山最高点的邻霄台。在邻霄台社坛东南边，柯述留下两块摩崖石碑：

或问社奚铭，予谓祭主敬，不敬如不祭。社稷岁再祭，所以为民祈报，而政莫先焉。予守兹土，视其坛地污且隘，不足以行礼，乃广而新之，坛壝器宇，靡不周备，敢不以告于后之人。于是勒铭于坛之东南、乌



《大唐开元礼》记录的州社祭祀规范

石山之顶，前为亭，约：“致养”，以其当州之坤也。

一句“为民祈报，政莫先焉”，让柯述感动了后世无数人。而另一段，就是他亲自撰文的《大宋福州社稷坛铭》：

后牧民，天乃食。维社稷，作稼穡。
 风雨雷，赞生殖。协时日，祭有秩。
 岁庚午，夏率职。即坤维，胝坛域。
 地污隘，制匪式。爰广新，古是则。
 辛未春，工告毕。斋有厅，器有室。
 暘若雨，事咸飭。后之人，敬毋斲。

斲，读作 lǚ 意思是终止。柯述告诫“后之人”：你们对大地的尊敬啊，永远不要终止。

当柯述站在邻霄台社稷坛前，不知道会不会想到去世多年的蔡襄？应该会的。当他少年时，蔡襄欣赏过他的文章，青年时，蔡襄提拔过他。元祐五年（1090）闽江洪水，柯述回乡任职以便赈灾，那年不单是福州城，蔡襄的家乡兴化府也



乌山顶邻霄台旧影

是“（台）风大作，海居之民飘荡万数”。而祭祀社神，其实就是和自然沟通协作，希望风雨顺时，万物有序，百姓平安。

政和元年（1111），乌山邻霄台上的风师坛迁移福州“西门外龙山寺之西”，雨师、雷师坛迁往福州“北门外法云寺之东”。《三山志》记载，“惟社稷坛仍旧。”

柯述建的这个社稷坛，使用了将近两个世纪。

明正德《福州府志》提供了宋以后的社稷坛地点：

社稷坛：在郡城北二里怀安县二都天王山下……元初，迁法海北。国朝洪武六年，



乌山上的社坛铭

知府杨士英移建今所……

那么社稷坛应该坐落在哪儿呢？

元代至今，法海寺还在，现今的门牌是“法海路1号”，法海寺北面，如今是安泰派出所。

明朝时福州州社迁建，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一上位就颁发诏令：“府州县社稷，洪武元年颁坛制于天下郡邑，俱设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

所以，福州的社稷坛应当是奉命搬到福州城西北了。

清乾隆《福州府志》（徐景熹版）卷14，“社稷坛”条下则提到清中前期社稷坛仍在“郡城北”，“乾隆五年，重修坛制，累石为之。”

明清的社稷坛究竟在哪里？

我们扒出明人王应山《闽都记》卷24记录：

义井，在社稷坛东。有石栏刻“义井”二字。

那么，找到义井，也就等于确定了明清社稷坛的大概方位。

在北二环外省直湖前小区靠天泉路一侧至五凤山一带，原有义井村与黄埔村。笔者分别走访询问过两村村民，不约而同的说法是：义井公交站前、天泉路的分路带上，有古榕树，旧为两村分界。榕树往北三环高架桥方向，约三四百米



天泉路上，距离古义井三四百米的大榕树，西为义井公交站

处，曾有义井。数年前为建高架桥，已填埋。

查看义井西边，正是福山郊野公园7号入口。明清时福州社稷坛，很大可能就在这一带了。

社稷的信仰，随着旧政权的湮灭，再无官祀。那么，社神最终会去向何方？

这个问题，800年前就有人问过朱熹。

在《朱子语类》卷90，有人问“后土氏之祭”是什么来源，朱熹说，“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谓‘土地’者”。

——城市与村庄的角落中随处可见的小土地神、清明扫墓时常见刻着“后土”的旧石碑，都是民间对社稷文化的保存。社神，依然陪伴在普通人的身边。

笔者猜想，闽侯乡村至今仍有“做半旦”、全乡分享酒食的习俗，会不会就是3000年来“里社”遗存的活动？

冶山的“花样年华”

青色

“闽之有城，自冶城始。”冶山，又名泉山，福建的第一座王都——冶城由此发端，闽越王故城即在此山。近年，冶山公园也因之更名为冶山春秋园。

东冶在哪？不少考古学家论证它就在现今福州的冶山。2200年历史风雨，这座山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但在我的眼里，它是一座“花果山”，它的四季流淌着花果之香，有着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

二十九景成往事

现存文字记载中，冶山有过两次高光时刻：一是中唐刺史裴次元兴建马球场并开辟配套景观“球场山亭”中的冶山二十九景。二是民国时期以陈衍、施景琛为代表的闽侯县名胜古迹古物保存会，觅古拓荒，对冶山摩崖石刻进行全面修复。

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的《三山志》是

最早记录冶山二十九景的志书。《三山志》载，唐元和八年（813），福州刺史裴次元在冶山之南建球场，即山为亭，剔石浚坳，得二十九景，并赋《辟球场二十咏》，将之题于亭壁，其下属冯审撰文纪事勒于石。不过40多年的时光，到了大中十年（856），亭壁诗已尽数丢失。又一任刺史接力，四处访求诗本，终觅得，重刻于碑阴。之后，石碑又神秘消失，不知归于何处。北宋熙宁



“球场山亭记”碑（背面）

年间，福州太守程师孟重建子城，石碑重现，之后，该石碑又湮没。

近千年之后，石碑重见天日，仅存不足三分之一的残文断字。这便是1958年出土的《球场山亭记》残碑。经磨洗后的石碑，配合《三山志》和民国修复的冶山二十九景部分遗刻，我们可以复原曾经的冶山二十九景，可在“翳荟荒榛”的冶山中嗅闻山林草泽之味，甚至可隐约端见千年之前的福州样貌。

冶山二十九景为：望京山、观海亭、双松岭、登山路、天泉池、玩琴台、筋竹岩、枇杷川、荻芦岗（亦作菝芦岗）、桃李坞、芳茗原、山阴亭、含清洞、红蕉坪、越壑桥、独秀峰、笕笕坳、八角亭、磐石椒（亦作椒磐石，现在冶山上的摩崖石刻即为“椒磐石”）、白土谷、涟漪亭、东阳坡、分路桥、乾岗岑、木瓜亭、石堤桥、海榴亭、松筠陌、夜合亭等。现藏于福建博物院的残碑中，部分景题缺失，但天泉池、玩琴台、筋竹岩、枇杷川、笕笕坳、八角亭、磐石椒、白土谷、菝芦岗、双松岭、芳茗原、越壑桥等十二景仍历历可辨。冶山二十九景为我们缓缓展开一幅精彩纷呈的唐时闽中园林画卷。透过斑驳的岁月，我依稀看到次第花开的花果枝叶上还有雨露未干。

尽管《球场山亭记》残碑上关于二十九景的记录有限，但不妨碍解读。二十九景经累代修复，包括最近的一次庚子年（2020年），仍有含清洞、八角亭、白土谷、涟漪亭、木瓜亭、海榴

亭、夜合亭等七景尚未找到或修复，这让我叹息。

山中花树皆动人

冶山二十九景中，与植物有关的景名13个，包括双松岭、筋竹岩、枇杷川、荻芦岗、桃李坞、芳茗原、红蕉坪、笕笕坳、磐石椒、木瓜亭、海榴亭、松筠陌、夜合亭等，它们流荡着花木芳香，也构成了唐时冶山的动人风姿。

我常想，这些曾经摇曳生姿，又在岁月中隐没的植物到底是什么？千年风雨中，它们是否改变了模样？

枇杷川、桃李坞、双松岭中的枇杷、桃、李、松自不必说，古今不变。松筠陌、筋竹岩、笕笕坳中，松筠为松与竹，筋竹、笕笕均为竹子。裴刺史题咏的“二十咏”幸存下来的不多，《双松岭》是其中之一，其中有“岁深鳞甲起”“干云势何已”之句，园林专家由此猜度，此双松可能为马尾松。



“枇杷川”石刻

可敬的是，双松之一，历经千年岁月的磨砺，跨越重重阻隔，顽强抵达 20 世纪的民国时期。

红蕉坪、磐石椒、木瓜亭中的红蕉、椒、木瓜，似是而非，让人捉摸不定。

见到红蕉，我们的脑海中涌现的是超市可购的红香蕉或红芭蕉。不，尽管香蕉栽培史有 2000 千多年，但这红蕉近年方才培育成功。老一辈的口中，曾经的红蕉坪生长着一丛自宋以来生生不息的红蕉，可惜它没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无缘一见。

“磐石椒”的“椒”，会不会是辣椒？史料

的记载，否定了这一推论。辣椒引进中国的时间是明后期，只有 400 多年的历史。此中之“椒”，当指花椒，原产我国，《山海经》《诗经》《楚辞》中都有它的踪迹。花椒的果实繁密，常被用来寓意“多子多孙”。

“木瓜亭”中的“木瓜”，指的是木瓜属海棠，而非番木瓜（番木瓜原产美洲，17 世纪末才引进中国）。据当代植物学家潘富俊考证，此木瓜为皱皮木瓜，即我们常说的贴梗海棠。在《草木缘情》中，他写道，《诗经·卫风·木瓜》之“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中木瓜指的是皱皮木



“红蕉坪”石刻

瓜，即贴梗海棠。总之，古典文学中的“木瓜”一般是指贴梗海棠。

冶山二十九景中有七亭，可谓“树绕亭，亭映树”，其中与植物名有关的山亭，除了木瓜亭，还有海榴亭、夜合亭。

关于海榴，史料上有两种记载：一为山茶，一为石榴。与裴次元同时代的皇甫曾写过海榴诗《韦使君宅海榴咏》，有“淮阳卧理有清风，腊月榴花带雪红”诗句。此中，腊月开的榴花，是山茶花。石榴又称安石榴。《辞源》中，“海榴”条明确地解释为：“即石榴，以自海外移植，故名。”尽管有此一说，但查阅唐诗中的海榴，无一例外地指山茶，包括韦应物《移海榴》、温庭筠《海榴》、杜牧《见穆三十宅中庭海榴花谢》等。

夜合即合欢树，又名合昏，叶子到了傍晚便如含羞草般闭合。很难想象，彼时的冶山生长着合欢树。即使在今日，合欢在福州也不多见，我仅在尤溪洲桥头及贵安发现数十棵。作为近年风行的地震观测首选树种，不知它该为自己的敏感感到快乐，还是痛苦呢？

“簇茂满东原，敷荣看臙臙。采撷得菁英，芳馨涤烦暑。何用访蒙山，岂劳游顾渚。”这是裴次元留下的关于“芳茗原”的诗句。曾经的冶山东部有茶园，茶质堪比当时茶中名品——蒙山茶和顾渚茶。福建当代文史学者陈叔侗赞曰，这是



“芳茗原”石刻

早于《茶录》300年的闽中第一茶诗。由此看来裴氏还是一位品茶专家。

秋日，站在冶山之上，荻芦花在山岗上蔓延，与白云交相辉映，风摇动着它们，如浪般翻滚，充满诗意和野趣。这便是“荻芦岗”或“荻芦岗”的来历吧。荻芦自古便是文人的寄情抒怀之物，它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南荻北芦”，南方多见荻草，北方多见芦苇，二者极易混淆，因此在古诗词中常把二者统称为荻芦或芦荻。

唐时的冶山，修竹乔松林立，茶果飘香。春天，桃、李、山茶、海棠花开此起彼伏，金黄枇杷缀满枝头；夏天，桃实李果昂然枝梢，粉如美人之腮，夜合红白花丝随风颤动，木瓜悄结如蔡小果；秋冬的荻芦将山头染白，风过松涛起，红蕉与花椒在夺红斗艳……真真奇花瑞果，四时不凋，好一幅醉人图景。

昔日花果飘香地

千年时光，倏忽而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冶山再迎芳华。

彼时春天，走进中山公园（冶山公园的前身），万朵桃花涌动。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福州旅行指南》载，中山公园于1927年方开辟，“为贡院旧址，屏山南麓与园连成一片”，曲径旁杨柳飘摇，其地广场数亩均种桃花，春光明媚之时，“花红似锦”。另外，在书的插图中，有一幅图引起我的注意，在屏山南麓往镇海楼的方向，是成片桃花林，书上称之为“屏山桃花浪”，其左上角便是镇海楼。在图中，我们无法得知桃花浪的确切位置，也不知这屏山桃花浪是否

即为中山公园的桃花林？

冶山附近曾有个花果山。卢美松、谢其铨主编的《越王山志》引《石遗室文集》中的“收回屏山果树碑记”曰，在屏山与冶山之间，“北距镇海楼前之七星缸，南抵越山书院墙址，东西城垣为界”，有超过43亩的果园，共种果树1334棵，其中桃树852棵，李树314棵，龙眼34棵，枇杷26棵，黄弹98棵，“蔚成茂林，历有年所”。该果园划为“保安林”，永远不得买卖。碑记时间为1916年。

这片果园结局如何，没有下文。但是，闽侯县名胜古迹古物保存会整治冶山，修复泉山古迹时保留种植不少果树，让这里成为一个浓缩版的果园却是事实。民国时期的冶山不但继承了唐时花木，还在它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此时主事人的花木情怀一点也不逊于

唐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坛岗”“桐岵”“薇岵”“辛夷塘”“过冬梨记”“荔枝岗”赫然出现在冶山摩崖石刻的“龙虎榜”上。他们在“桃李坞”种桃李，在“枇杷川”旁种枇杷，在“薇岵”附近种紫薇，又辟“王坛岗”“荔枝岗”（荔枝岗为佚刻，二岗附近原各有一株王坛和



“王坛岗”石刻

荔枝树)，在原有红蕉林的基础上，修复“红蕉坪”。不但如此，他们还在泉山南的“松筠陌”旁，夹道植松10株，在辛夷塘畔植白辛夷（白玉兰）3株，重建“海榴亭”。此山虽小，但花果俱全。

此中的王坛，早在1000多年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曾载：“王坛子，如枣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一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王坛即福州方言中的“黄弹”或“黄淡”，也就是黄皮果。

“桐姑”“薇妃”出自《诗经》，《诗经·魏风·陟蛄》有“陟彼蛄兮，瞻望父兮……陟彼妃兮，瞻望母兮”之句，以蛄妃指代父母。施景琛《榕城泉山纪略》云，此二刻为纪念父母而作：“桐姑”中的“桐”为父亲施桐卿的“桐”，“薇妃”中“薇”为母亲宋薇卿的“薇”（为此，他们还在山北种紫薇数十株）。引用《诗经》，将父母之字嵌入其中，又以桐与薇喻父亲的高大伟岸和母亲的温柔美丽。这是民国冶山摩崖石刻的点睛之作。冶山植物无不彰显着中国植物文化的博大精深。

值得一提的是，修复冶山时，除了“双松岭”遗存的那株千年古松，附近尚有一数千年树



“桐姑”“薇妃”石刻

龄的秋枫。那时已数抱之围的古松，一半被武赞卿观察史围入私宅，堵以高墙，致枝叶发育不畅，后逐渐枯灭，殊为可惜。时任闽侯县县长王若恒则留下《过冬梨记》刻记：“是树闽中仅有二株，一在厂巷，一在泉山，大数抱，皆数千年物也，其叶能治背疽。”过冬梨，就是福州乡土植物秋枫，如今厂巷那一株尚健在。秋枫本地名茄冬，常在暮春开花，秋天挂果，果如微型的成串青皮梨，稍甜。此记被刻于冶山南麓一块岩石上。不远处，这株古过冬梨树尚有一个腐烂树桩依稀可见。

欧冶池畔榕苍苍，无诸故城遗芳香。千年前的月光依旧倾洒在这片土地上，创建冶山二十九景的宦宦雅士已消逝，但蕴含中原山水园林风格和闽中植物精髓的“花果山”却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它荡漾着冶山不灭的“花样年华”。

梅花千户所

唐 希 图 / 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以中央集权的名义做了三件有意义的大事，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筑万里长城。秦长城是在战国时期北方三国北长城的基础上进行兴建、修缮和衔接。西起甘肃岷县、东达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冷兵器时代，为防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南侵中原起过一定的作用。到了明朝朱元璋时代，老将徐达在靠

海的榆关附近，背山面海修筑了长城东头的第一座关城，人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城墙延伸到了老龙头海滨，像一条巨龙一头扎进大海，完成了它作为人造工程与大自然的衔接。

防范突厥、匈奴有了北面的屏障，而中国的东面，漫长的海岸线上，自古有倭寇、海盗和红毛……如何防范？怎么抵御？尤其是在火枪、火



梅花古城东门外景



梅花古城西北通向大海的石阶

炮尚未发明或尚未广泛使用的时代。

闽江像一条龙，在入海的地方面向马祖列岛张开大口，长乐梅花、连江的定海一南一北扼守着这巨龙的上下腭，而琅岐岛和川石岛便成了闽江门户的天然屏风。

梅花，一个充满春情和诗意的名字，民间盛传它是出美女的地方，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中的记载，让“出产美人之乡”的梅花声名远播。大凡出美女的地方，基因遗传和血缘传承之外还需大自然馈赠丰富的物质和无污染的环境以及丰厚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柱，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梅花，是这样吗？

位于闽江口咽喉要地的梅花，自古是兵家必守之地。唐代始有史籍记载，宋代属于芳桂乡

新开里的一个村，估计其繁荣于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取得中央政权之后，在沿海择地建造城堡式的军事基地。明代的军队沿用了金元时期的军制，设卫和所。所，原是金时的官名，系女真族语言“猛安”的汉译。元代时作为官名，“千户之长”称千户，按人数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种户，千户隶属于万户，并指挥着百户。明代的千户所统兵约 1200 人，兵力相当于今天一个团，隶属于卫。而卫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师的建制。千户统领着 10 个百户，120 人的百户相当于一个连。据史料记载，镇守山海关的是一个师，那么梅花当年驻守兵力是一个团。还有更小的机构称“巡检司”和“水寨”。

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奉朱元璋之圣



梅花古城东门外景



梅花西北城墙遗迹



海风雕刻过的砖楼

旨，在福建沿海筑城堡 16 座，其中之一是在梅花建造军事城堡，将原有的巡检司升格为千户所，那一年实际屯兵 1540 人。城池建在山海的突出部，用红褐色的花岗岩构筑，上设 24 座战楼，20 个窝铺，除临海的北面没有设城门之外，其余三面均有城门楼。与陆路相连的南门早已损毁，与水路相通的西北门，虽然没有了城门，但依山而筑的城墙，陡峭的狭长石级，以及依稀可辨的古垒依旧壮观，成为今天进出梅花古堡的重要通道。与古垒旁曾经设置烟墩的将军山相接的东门至今保存完好。不宏伟却十分坚固的城门，城外不大的街市小广场上一口方形高山水井，以及周

边古老的商住建筑，这些都是梅花作为军事重镇，数百年军民联手屯边的历史见证。

到了明代中叶，梅花不仅是闽江口的重要军事堡垒，还是长乐主要的官方粮库所在地。

战乱中的日本，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武士、浪人结为一体，流荡海上，侵扰和掠夺中国沿海，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中国人民称之为倭寇。

梅花人民的抗倭战斗是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五月和第二年的二月打响的。有七股倭寇集合了数千人，由主力战舰和普通渔船共 130 多艘组成，在梅花洋海滩登陆，攻打梅花城。残酷的战争经过梅花人数百年的口头流传变得幽默且



梅花拥军爱民碑



古城小街古厝方井

充满了智慧。

据说，倭寇们打着赤膊，身上画着刀枪不入的图腾，挥舞着弯弯的倭刀，利用云梯企图攀上梅花城。当年梅花城守军的指挥官是当地出生的军人林位，年龄30多岁。梅花人一面点燃烟墩报警，一面用大刀、弓箭、石头打击敌寇。梅花的妇女不愧是军人和渔夫的女人，她们将家中的大鼎扛上了城头，用石块架设简易灶台，燃起柴草烧煮沸水，敌人在城墙上靠了云梯登上来，梅花女一勺子沸水迎面泼下去，赤裸的倭寇“刀枪不入”也只有惨叫的份了，捂着烫伤的脸滚下云梯。有人说，井水供应不足时，连米泔水、猪食也用上了，那东西烫烫的，浇在身上，杀伤力就更大了。

五月，正是黄瓜鱼的鱼汛期。打鱼归来的梅花渔民远远地见到梅花城上如火如荼的战斗，那烟墩的火和城墙上烧沸水的烟是那么悲壮地交织

在一起，便结集了连江壶江的渔民，其中不少是他们梅花人的姻亲，赶来救援。手持木棍、鱼叉的渔民不与倭寇硬拼，而是用智斗。

渔民们选择一片烂泥滩涂，将捕获的黄瓜鱼从船上撒进海滩。饿着肚子攻城的倭寇正垂头丧气地坐在海边休息，见到大量的黄瓜鱼在海滩上涌动，忽上忽下地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经不住诱惑，放下倭刀下了海。但进入滩涂的倭寇们只有后悔的份了，陷下去脚就是拔不起来。螺号声中渔民的船只回头追过来，壶江的青壮汉子赶上来，鱼叉、棍棒齐飞，梅花城里的军民乘势大开城门追杀出来，倭寇偿还血债的时候到了。

另一次巧退倭寇的主角是林位将军。倭寇包围梅花城久攻不下正进退两难的一天，倭寇营地附近来了一个卖草鞋的年轻人。只见插着草标的草鞋又长又大，一般都有三尺多长。寇首觉得奇怪，便扣住年轻人打听这长草鞋的用途。卖草



古镇面向的海湾

鞋的说，这是专门卖给梅花人的，梅花男人又高又壮，个个身高七尺，力大无比。倭寇人种本来就矮，又有恐高情结，一听对方身高七尺便在心理上矮了半截。倭寇追问他城里的情况，他以军事外行人的口气，夸大其词胡编了一番。敌人按他的指点，在城墙下水道口看到了大量的残菜剩饭，城里粮草充足啊。正饥肠辘辘的倭寇估量着不是对手，赶紧撤退了。倭寇两次撤退时都在梅花洋面遭受到抗倭军民的夹击，被杀了贼首，沉了贼船，连引路的水上汉奸也没有好下场。

平定了侵扰梅花的倭寇，林位将军在调离途中病逝，年仅 37 岁。梅花人将他奉为神，祀梅花城中湖山堂里，并改称调羹境林位宫。历经战乱和动乱，木雕神像仍保存至今，现林位宫建筑成为会所式的百姓公益活动场所。

在历次的战争中，梅花人与壶江人结成深厚的友谊，生活中他们互为“姻亲”，战争中他们以“依舅”作为暗哨口令，世代流传。甚至在外

的两乡人也因此成立了梅壶乡亲的旅外联谊会。2002 年正月，由壶江村出资兴建的梅花镇梅壶友谊楼在将军山落成，军事故垒梅花新添了当代的人文景观。

梅花古城，是抵御外侵豺狼的卫士，又是梅花人喜迎宾客的热情化身。明代万历年间，琉球国蔡大夫的女儿蔡红亨从海路入朝进贡刺绣工艺品时，在海上遇风漂至梅花，与梅花蔡氏乡亲认了宗亲，梅花人称其为蔡姑婆。蔡姑婆将她的刺绣手艺传给梅花女子，梅花美女多了一道技艺，号称“梅花神绣”。蔡姑婆病逝之后葬在马鞍山田螺洞。万历皇上赐封她为“精巧妙明懿德夫人”并建“琉球夫人庙”，至今尚存遗迹。

今天的梅花女走出了梅花古城，在茫茫人海之中，她知道，她是梅花女，她的美丽来自那祖辈的血脉，来自天风海涛中的千户所古城，来自古城红褐色的花岗岩石缝中、在灰绿色的苔痕里传递出的人文精神。



如今熟鱼的加工开始工业化



调羹境林位宫

翠环碧佩带当风

——梅溪镇今昔

池宜滚

悠悠闽江，如身姿曼妙的神女，倚卧青绿闽地。她头枕武夷山麓，手挽戴云山与鹳峰山，赤足探于东海，裙裾曳于江口，腰身靠在闽清腹地，又于中下游收纳了梅溪水，哺育出溪江风韵兼得、山水特色汇聚的集镇——梅溪镇。

梅溪镇，地处闽清东部，全镇 135 平方公里，环绕城关，跨越闽江两岸。从空中俯瞰，整

个镇区外围山脉围合，核心区为低丘平地，宛如一只精致灵动的碧玉环缀于梅溪缎带端头，佩挂在母亲河闽江的腰间。一江中流，“玉环”左为梅埔片区，右为上埔、渡口一带，绿野与江水、山村与城镇、高峰与平原、陆路与航线、老宅与新区、村寨与楼林、农业与商贸，镶嵌呼应，交织出精彩的山水城乡画卷，引人投入、沉浸、迷



恋、缱绻。

梅溪有溪，史诗流淌。梅溪镇西起梅溪入江口，因溪而得名，伴溪而生发。随溪流而来的，既是一方水土的滋养，更有一方人文的沉淀。她扼守在闽清城关水陆的入口，自古便是对外沟通的门户，宋时称奉政乡宣政里，应是上级政令最先送达的地方。镇之南陲的南泉村有古驿道，北宋状元许将题写《碧岩亭》诗的碧岩亭遗址便在此间。《闽清县志》“亭台”篇载：碧岩亭，在一都（今闽清城区一带）。宋邑状元许将诗：“旧室曾传古岸边，新亭同赏碧岩前。日生狮子峰头树，烟伴榴花洞口泉。黄叶入秋山出地，白云临晓海垂天。飘然踪迹今何定，别去江湖又一年。”

许将，北宋闽清人，福州第一位状元，文武之名盛于当朝。传其年轻时路过此处，饮泉休憩之余，在亭壁上题诗赞叹家乡山水并慨叹时光流年，其乡情乡愁交织，情怀满溢。近年，镇里

在遗址处修建南扶山亭，并引山泉至此，成为群众赏景纳凉与汲取“状元泉”的胜地。南宋名哲朱熹，晚年亦流连闽清山水，曾在此地停留过一段时光，得见梅溪与闽江交汇处梅花缤纷，欣然在溪边石壁题留“梅溪”二字，此乃圣人赐名，自此溪曰梅溪，镇曰梅溪镇。他的点睛妙笔，更加激活了一方山水的毓秀功能。朱熹收了一个来自梅溪镇石郑村的郑姓学生，名性之、字自诚，初见面就赞称：好大名大字！后来郑性之高中状元，再后来郑性之为朱熹学说的正名不遗余力，并最终将朱熹理学推到南宋官方哲学的高度。他更是不忘家乡源流，题写的“万松岭”“白岩”至今仍分别留存在樟洋村和三溪乡的古驿道石壁上，落款均为“清溪郑性之书”（清溪，梅溪旧称）。时光惊鸿一瞥，走过多少贤人雅士，仅梅溪一个镇，就荟萃了如此丰富的名人逸事，他们共同构筑着闽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高地，更为



当地打造出了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梅溪有江，画卷长铺。闽江干流 541 公里，在闽清境内 29.5 公里，梅溪镇河段 15.3 公里，成就了她的揽江入怀和通江达海，倾其江景之美、江流之利。自梅溪入江口往上，6 公里处是水口坝下航运枢纽工程及库湖，9 公里处是华东最大的水电站水口大坝及库区，长途奔袭而来的汤汤江水，在此被驯服成静波深流，并反复澄清为一川清流，再下泻到梅溪镇，成就一片温柔静谧。十多公里的江面，充盈平缓，有如镜湖蓝幕，其天光水影，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更是四时不同，让人轻松阅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奇幻变化。溪口之处则汇入经千余米落差、数百里流徙的梅溪水，与闽江对冲交融，形成两三公里“泾渭分明”的图景。至于渔舟唱晚，白鹭翔舞，牛群溯江，更是日常动态美景。而作为历时千年的黄金航道，它的通航作用正在复苏，常有深深吃水的千吨级轮船溯流而上，与轻灵漂浮的渔舟擦肩而过，掠起的水波彼此推击又交融成一江荡漾。沿江的公园，栾树、菩提榕、三角梅、蓝花楹成排，开阔处碧桃、茉莉花、红梅、蜡梅成片，沿着春夏秋冬，次第打扮季节，

妩媚时光。夜幕下，河岸灯光与水中倒影交相辉映，大大小小的场地歌舞飞扬，步道间行人徜徉，和谐着群众的娱乐生活。“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果真处处可见。

江村是一组长歌。每一段江岸，都分布着不同的村落，它们各有独特的地理与文化魅力。最上游的樟洋村，海拔 300 多米，田畴成片，阡陌相连，是一个耕读双馨的传统村落，在其 900 多年的历程中，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单体上千平方米的明清时期古建筑就有十多处，其中宝英厝、林氏祖厝、炉边厝、上月厝、上下寨等都已修复并活化利用，予你置身古意村庄，遐思旧时风情的优美环境。文昌宫一直都是老村的塾学圣地，由此出发，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的人数众多，而且文魁、武魁俱全，不少古厝都高悬着各式功名牌匾。近现代依然不减浓郁的书风文



闽江边白河江自然村连绵的橄榄山

气，人才辈出。

江北南坡的白河江自然村则有另一番生机。当地传承橄榄种植，近年更是育化出独一份的甜橄榄品种，聪慧的村民通过高位嫁接实现老橄榄树“树上换种”，短期内就繁育成漫山的摇钱树。88户人家，1500亩橄榄林，年产值均在5000万元以上，单项户均年收入60万元，人均13万元。更是带动、盘活了整个梅埔村的农业，形成数万亩的鲜食甜橄榄基地，单项年产值达十亿多元，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橄榄第一村”。而梅埔村的“中间地带”紧临“闽江第一湾”，弧形的江流紧紧拥抱探向水域的山地，峰福铁路与站点就在畔上，客运站已然停用，货场依然吞吐着大量的集装箱货柜，成为南来北往的“大件”物流集散地。一列列绿皮火车或货列穿梭来去，不懈地用汽笛召唤着一方时空。这伴江而行的“慢线”，也

必是过往客人们心中的静好风光吧？

寨子是一角历史。梅埔村最尾端有一座雄峰，如巨鳌出江，当地称之为鳌峰，峰顶座坐落着一栋迄今200多年的古寨——鳌峰寨。寨子为梅埔邓氏所建，主体建筑由两埕两进两角楼组成，占地约7000平方米，依山势布局，大门垒以数米高的石基石墙，形成雄踞一方的庞然大物。邓氏崇尚文武传家，长年聘文武教师教导子孙。凝固在建筑里的则是主座，雕梁画栋，窗棂鹤影，处处文采粲然。露天“武埕”开阔，似仍回荡着子弟习武的呐喊。在科举考试中有多人获“解元”“举人”“贡生”及“廷监武庠生”“廷恩武庠生”等功名，至今寨子外门与迎宾门上仍高悬“武魁”“文魁”等牌匾，证明着此寨不失为一座文武皆全的大宅院。

与鳌峰寨隔江“对峙”的是桥东村谢家庄寨。寨子坐落在千米高峰大湖仙主峰的山腰，是东晋名流谢安后裔的宅居地。1700年，26岁的闽侯人谢尔显在附近烧木炭，望见对面巨石坡面处，晴天常雾气缭绕，而大雪天里却了无雪迹，便在这风水宝地搭盖茅房居住，自此兴家。谢氏后人据谢安“东山再起”的故事，将此处取名小东山，后讹为桥东山。数代后，谢家富于闽间，便大兴土木，先后建起了可扬公前厝、可扬公后厝、道典公厝等三座大院落。



鳌峰寨

庭院总占地近 5000 平方米，建筑分布于多级台地之上，层层叠叠，连成一片庄寨，围以外墙，有如宫殿。

城是一阕词。梅溪镇现为闽清县“大城关”的新城组团，经十年开拓与沉淀，往昔的郊镇一改边缘、质朴状态，闽清城关得以从梅溪时代迈入闽江时代，梅溪镇得以从乡村时代迈入城镇时代。走入其间，尘世风情瞬间就将你包围。地摊上一半河鲜一半果蔬的占比告诉你，这里是山水相融的地带。网兜里的青壳蟹拥挤并不懈地相互推搡，吱吱的吐水声和沙沙的摩擦声交混，宣示着横行一族的桀骜不驯；数斤重的河鲤在一盆盆浅水中噙合着腮帮子，大指甲般厚实金黄鳞片展示着年岁与分量。

桥最是风景。横卧江面的新旧两条大桥同样让人瞩目。旧桥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自上埔村与上梅埔相连，长 700 多米，双向两车道，为花

岗岩砌筑桥墩与拱跨，混凝土桥面，一身的古朴之风，人行道与主路之间的护栏特别厚实。夏日夜晚，好多人到桥上纳凉或抛竿垂钓，每当有人拎起一条满身水汽的战利品，都会引来惊呼与围观。新桥自下游的新民村通石湖村，与 316 国道及 308 省道横向对接，长 1 公里余，凌空高架，犹如巨虹卧波，头尾没于橄榄林间，又似龙入绿海。如此两岸双桥，形成了一个绕江的回环，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兑现成最灵动的人景合一。

一江福水，磅礴而来，滋及斯土，给当地人民造就了琅嬛福地。当地人也承大江之运，世代勤勉，休养生息，成就一方蔚然风华。

“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一个梅溪镇，万米闽江水，“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如此一方山水，终究要来一趟吧？值得呢！



俯瞰梅溪新城

青州之青

罗榕华

青州市位于沙县东北部，地处三明、南平交界处，东与南平市西芹镇、王台镇交界，南和郑湖乡毗邻，西南与高砂镇接壤，西北与高桥镇相依，古有“远县近府”之说。

青州市辖青州、洽湖、异州、坂山、澄江楼、涌溪、管前、胜地、溪坪、前山、朱源、后

洋12个建制村。

地名之青

青，象征万物萌生的春天。所以，“青州”是一个充满阳光、朝气的地名。



“青州”地名来历有两说。一说来源于当地沙溪东部一片冲积地“沙州”，根据汉代五行学说，东方谓“青”，故引申称为青州。另外一种说法是指镇驻地青州村三面环山，青松葱茏，恰好其对面河滩又有一大沙洲，故以“青松”和“沙洲”各取一字，作为地名。

沙溪由青州西南至东北流入南平，全境有马铺溪、涌溪、澄江楼溪、异州溪等四条溪流汇入沙溪河。这些溪流好比青筋血脉，纵横交错根植于青州腹地。青州不少村名也与这些河流息息相关。“溪坪”因在小溪两旁建村得名；“洽湖”因该村段上下溪流有两个溪湖而得名；涌溪村来历则出自天湖山流下的涌水过境。澄江楼村名的来历更加传奇，据说是古代该村出过驸马大官，而建“望江楼”纪念得名。民间传闻澄江楼村年轻才子陈文善，高中进士，当上了御史大夫，并被皇帝招为驸马。有一年，陈文善要回乡省亲一些日子，公主不愿同行，她担心到沙县乡下后吃不到京城的黄尾鱼。皇上获悉后，差人先送黄尾鱼至澄江楼，养在池塘里，可以随时取用，吃不完的黄尾鱼放生于沙溪河中。自此后黄尾鱼便在沙溪繁衍生息，原本远在京城的美味走进当地平民家，百姓感激，称之“驸马鱼”。

明崇祯三年（1630）农历八月，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第四次入闽，十一日他自延平逆流而上，至“永安溪（沙溪）”二十里时“舟为石触”，赶紧采取了“榜人以竹丝绵纸包木片掩而钉之”的应急措施。以路程推算，徐霞客遇险河段恰好是



青州澄江楼村库区移民文化活动中心、管前村 罗榕华 / 摄

沙溪青州河段。

水运之青

青州之青，茂盛状也！寓意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青州地理位置特殊，为交通枢纽。它紧贴沙溪，鹰厦铁路、205国道、福银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火车、汽车、船只来往频繁，客货运输吞吐量大。尤以旧时的水运盛矣！

沙溪通航始于元末，至正二十六年

(1366)，福建省平章政事陈有定，为了向被各地起义军围困的元大都运送物资，派人“凿石去障，以运汀粮，舟始得通”。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沙溪航运促进了下游两岸乡镇的繁荣，成为地方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为闽江水运开辟出一条“黄金水道”。正因这条“黄金水道”，沙县成为闽西北各地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带来“八方商贾过往，千里商客云集”的繁荣景象。

历史上，青州集驿站、码头、渡口于一体。当时临溪的青州舟舶星聚，商旅辐辏。来往“黄金水道”的商船、木排都会在青州停泊。那时的澄江楼设有货场，堆积竹木，转运各地；洽湖村和管前村不少村民从事水运工作。

青州管前村是沙溪水运的重要驿站。在通信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它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同时是物流的重要驿站。管前村古称“湖山”“馆前铺”，因临近沙溪河道，自唐朝以来便是商业繁荣的水运重镇。且管前村因是沙县到南平的中间点，两地之间沿着沙溪河设有五里一墩（标识牌）、十里一铺（驿站）。因此，延平太守陈公能拨公款，于明嘉靖五年（1526）在此建立驿站，名曰“湖山公馆”，以此方便公务人员往来和文书信件传递。

据史料记载，由于管前村驿站的设立，文书、情报、邮递等业务逐渐发展壮大，也带来商贸运输的繁荣兴盛。管前码头显得十分繁忙，民间有“放排过湖山，担盐半月还；夜宿馆前街，

日出水口难”之说。鼎盛时期，各类商帮穿梭不断，饭馆、酒肆、茶社、药店、铁铺、油坊等店铺林立。明清时代，管前到福州的水路一直是输送木材的主要渠道。从清流、永安、沙县漂流而下的木材，汇聚于管前码头，在这里重新装钉成浩浩荡荡的木排，顺着沙溪直达福州。繁忙时节，有100多名村民从事放排工作。

管前码头主要活跃着三类人：商贩、放排工及搬运工。有固定的店铺，例如茶馆、酒馆、面馆等，最多的是茶庄，主营当地乌龙茶。据民国十七年（1928）《沙县志》记载：“清同治初期，茶市大兴。管前与富口、琅口、渔溪湾、涌溪等地茶庄林立，主要生产乌龙茶。”流动小商贩一般是在家烹饪好食品，用篮子或筐子装好，手挎着、肩挑着到码头上售卖。小商贩的吆喝声为管前码头增添了人间烟火气。

产业之青

青州之“青”，春之代称也！喻示可持续发展；代表着新生力、新技术、新时代。

竹产业曾经是青州的支柱产业之一。早在2005年，青州镇山林面积就有14.47万亩，其中毛竹林面积达3.5万亩。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青州的竹产业发展奠定了可能。

竹凉席产生的历史很早。2000多年前，老百姓便以竹子为原料，破篾织席。竹凉席因具有消暑的功能备受百姓喜爱。20世纪80年代初，青



竹凉席工艺校园现场教学、竹凉席制作 钟积金 / 摄



青纸北区生产厂房 闫闰华 / 摄

州镇涌溪村几位农民合伙创办了两家竹凉席厂。他们生产的是一种新型的竹凉席——麻将凉席（因竹片像麻将块，故称）。这种凉席用竹片，牛筋线串联，由于对背部有较好的按摩作用，又称“保健竹凉席”。

1997年，全县竹凉席厂发展到230家，共生产竹凉席150万余床，创产值1.8亿元。当年“天河”牌竹凉席在全国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有26.3%的份额，居全国同行之首。

青州造纸厂于1958年开始筹建，1971年10月全面建成正式生产。经过50多年的发展，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国有大型上市企业。从一条生产线发展到四条生产线，年产量从1970年的5万吨发展到2017年的55万吨。从单一纸袋纸产品发展到集普通及伸性纸袋纸、牛皮包装纸、溶解浆、漂白、本色木浆、竹浆板等于一体的国有大型现代化造纸企业，成为

全国纸袋纸重点生产企业，入选全国1000家重点发展企业、福建省重点骨干企业。

2000年，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来青山纸业考察时，做出了重要嘱托。牢记嘱托，青山纸业发展成为国内率先推行“林—浆—纸”一体化的造纸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突破毛竹减法制浆造纸技术难题，充分利用毛竹生长周期短、一次造林、永续再生的特点，实现以竹代木，构建了更加“低碳、环保、可持续”的“林—浆—纸”一体化绿色产业布局，为造纸工业实现可持续、绿色循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光明之青

《说文解字》说：“青，东方色也。”青属木，是国人喜欢的一种颜色——生命的颜色，昭示着光明与希望。

青州地理位置特殊，由南平进入沙县地界，首经青州。青州市是沙县东部的交通“门户”，历史上曾经是兵家行军经常歇息的驿站之一，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33年至1934年，先后有两场战役发生于此。

1933年7月5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东方军主力入闽作战。9月初，东方军攻打延平城时，采取的是“围城打援”战术，一方面继续围困将乐、顺昌，加紧佯攻延平城；另一方面集中主力待机打援。9月18日，驻守沙县之敌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奉命进至青州、马铺附近增援延平。东方军决定首先消灭这股敌人，以便适时移师击破由夏道西进之敌补充师，命令以红五师第十三团、第十四团，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红六师第十七团由西芹出发向马铺、青州敌人进攻。奉命担任前卫的红五师第十三团行军至芹山，与敌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遭遇。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号称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铁军”三六六团歼灭。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许多指战员重伤不下火线，第一营营长赵壁腹部被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他咬紧牙关，把肠子塞进肚腹，继续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牺牲。这次战斗，毙敌200多人、俘敌400多人，缴获敌团旗1面、步枪500多支、机枪20多挺及大批军用品，红十三团创造了以1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1个团的辉煌战绩，战后被授予“英

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军队进逼延平，十九路军向红军求援。1934年1月，根据中革军委电令，东方军再次实施“向东突击行动”，挥师将乐、沙县、顺昌等地。1月10日，红三军团彭德怀司令员在富口荷山司令部发布《向沙县进攻之命令》。12日，红三军团开始进攻沙县，李天佑师长率领的第五师担任主攻，曹德清师长率第六师担任助攻，洪超师长率第四师布置于沙县东北部的青州，阻击延平来援之敌。1月14日，获悉延平敌约一个师增援沙县，红三军团于半溪司令部发出命令，决定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围困沙县县城之敌，继续坑道作业，以备攻城。主力于15日埋伏青州、芹山地域，侧击延平援沙之敌并歼灭之。红四师按照军团部的部署于15日凌晨4时由琅口向青州进发，10时到达青州附近的马铺。这时，敌援军第四师已先期占领青州有利地形，红四师迂回敌军侧背实施攻击，经激烈战斗，击溃敌军200多人，取得第二次入闽的胜利。

东方军取得两次“青州战斗”的胜利，歼灭了进犯闽西苏区的十九路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扩大了政治影响，解决了部队给养困难，创建了沙县苏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给百姓带来了光明与希望。“青州战斗”创造了红色历史，光明之“青”熠熠闪光！



水木相融莘口镇

林新洪

在福建省地理位置中心，茫茫的绿水青山中，有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在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的连接处，由南向北流淌着清澈的沙溪河水；在坐标东经 118 度、北纬 27 度的地方，杉溪汇入沙溪，两溪夹岛，形成一个长条形的半岛，这就是莘口镇。

秦汉时期，莘口一带高山幽谷、林木繁茂，人烟稀少，实属蛮荒之地。唐朝末年，为了躲避中原战乱，北方士庶纷纷南下，渡过长江、翻越武夷山脉，相继逃亡至福建的崇山峻岭间，得以保存性命，繁衍生息。莘口所在的沙溪河畔，海拔 150 米，亚热带气候，四季温和，无霜期 300 天以上，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开发。北方士庶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在这里开始了垦荒耕种，逐渐形成村镇。

莘口镇自然景观优美，沙溪纵贯、杉溪环



绕，河谷与溪流错落相间，四周山岭耸峙，峰峦叠翠，山形千姿百态。向东望，有底特兰山、真人岐、普禅山，山脉相连旋转回龙，山崖绝壁长瀑高悬。更有香炉山景，天然云雾，左蟠龙、右附凤，面朝沙溪后叠荫。台亭楼阁之间，花香鸟语戏彩蝶。朝西看，龙祖山上古树浓荫，翠竹密布，山顶有“清荫亭”，乃光绪年间建造，时有沙溪县县令叶新第题“东面爱日，西面长春”“天近山头，行至山头天又远，月浮水面，拨开水面月还沉”。更有世界闻名的格氏栲花开遍山野。

有奇山，就有秀水，莘口之水，主流来自宁化、清流，在永安汇合龙岩、连城之水，入境又有明溪的渔塘溪和杉溪，丰水盈盈，静波漾漾，造就了一个天然的港湾。古时，福建因为崇山峻

岭，陆路开凿极为不易，大宗货物皆为水运，但莘口以上水道，水势湍急，河道中明石突兀，暗礁险藏，特别是清流沙芜到永安安砂30里险恶的水路，极其难行，河道急弯陡急，处处巨石嶙峋，就连很有经验的船工，稍不留神也可能撞上巨石，船毁人亡，人称“九龙十八滩，处处鬼门关”。从“鬼门关”出来的水，到了莘口河段，河道豁然开阔，河底黄沙平铺，水流逐渐平缓。平缓的河面上，逐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出现了许多木排。这些木排来自上游的清流、明溪，也有的来自永安、连城。这些远道而来的木排，经历了水上颠簸，特别是从九龙十八滩过来的，有些已经松散，有的已经成了三三两两的漂木。莘口优良的水域，便催生了一项重要的放排行当，成为莘口镇一项时间跨度最长、最主要的经济收入，甚至于影响至今。在经历了北方大乱之后，中原一带紧缺木材，福建的木材因材质坚韧、通体长材而受到特种用材的青睐，盖祠堂起大庙、修桥梁做桅杆，专门要永安三明一带的百年大杉木。海边造船厂也格外满意这里的马尾松，马尾松油脂含量高，浸在海水中



当，成为莘口镇一项时间跨度最长、最主要的经济收入，甚至于影响至今。在经历了北方大乱之后，中原一带紧缺木材，福建的木材因材质坚韧、通体长材而受到特种用材的青睐，盖祠堂起大庙、修桥梁做桅杆，专门要永安三明一带的百年大杉木。海边造船厂也格外满意这里的马尾松，马尾松油脂含量高，浸在海水中

不易被腐蚀，也不会蛀虫，且马尾松的韧性极强耐撞耐折，大型工程中所需的长跳板只有马尾松可以胜任。如此紧缺的木材，便成为当地热销的大宗商品。从水路放木排是唯一的运输方式，而放排的梢排工，也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职业。从上游而来的大小木排，在莘口停泊，在这里根据买家的需要，拆开木排，重新布好木材，再用竹篾竹钉绑牢钉紧木排，有的为了节省成本，将十几个木排连成一长串，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因木材中转的需要，当地百姓砍竹编篾削竹钉等产业自然兴起，饭馆旅社等服务业也生意兴隆。外地求购木材的客商云集于此，久而久之，莘口成了梢排工聚集之地，成为梢排的出发口岸，以至于连原先的地名都被逐渐淡化遗忘，而被“梢口”所取代。

1934年3月21日，彭德怀率领的红军队伍在永安一带和国民党军作战后，经过莘口，需渡河向明溪转移。当先头部队到达莘口时，已是夜里9点多，大街上黑漆漆的，空无一人。前方打仗的消息早就传来，镇上的青壮年怕被抓壮丁，都躲到山上去了，胆小怕事的村民也紧闭房门、黑灯无声。红军战士们忍着饥饿和寒冷，在空荡的大街上行

走，忽然见到有一间房屋的门缝里，透出了一丝微弱的烛光，红军战士小声叩门，并用当地方言和屋里的大婶交谈。“大婶，请开开门，我们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想借你的锅灶用一下，可以吗？”屋里住的是桥头街赖希谷的母亲，几天前，镇上就在传红军专打土豪劣绅，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在附近一带与白军打仗的消息。也不知道什么部队会来，如果是国民党军来了，为补兵员强抓壮丁，是常有的事。为安全起见，这几天她的儿子赖希谷与镇上的青壮年都上山躲避去了，只有她与小孙子在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她就壮着胆子开门了，首长叫战士们把带来的米和地瓜干倒在锅里生火做饭。饭煮熟了，战士们先盛一大碗给大婶和她的小孙子吃。



吃过饭战士们又把锅碗瓢盆刷洗干净，并留下两枚铜板答谢赖家大婶。为了不惊扰百姓，红军便在小街巷两旁的屋檐下静悄悄地席地而睡。雨后的沙溪，河水暴涨，河边只有一条小渡船，几千人的大部队怎么过河？第二天一早，先头部队的首长在民主庙前集合队伍，组织战士们到各家各户做宣传，想方设法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赖希谷的母亲上街逢人便说，昨晚红军战士进她家，煮饭还留下铜板酬谢。镇上的百姓，耳闻目睹了红军对群众秋毫无犯的事实，都纷纷动员在附近山上躲避的亲人回家。战士们分散到各家各户，一边帮群众劈柴、挑水、冲洗猪圈，一边跟群众拉家常，了解社情民情。当红军掌握了当地一些土豪劣绅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情况后，立即查抄了他们的家产，打开谷仓，将粮食分给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苦百姓。红军在莘口一天的举动，赢得了劳苦大众的信赖和拥护。当地群众纷纷为红军渡河献计献策。其中有一个放木排的人，提出用堆放在码头上的木头架一座浮桥的建议，被部队首长采纳。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架桥行动在天黑以后进行。在夜色的掩护下，许多百姓来到河边帮红军架起浮桥。有的挑灯编制竹筏，有的搬运门板架上木排，有的不顾寒冷跳进

河里，有的则骑在木头上，挥动斧头使劲铆钉。很快，一根根的木头编成了木排，一个个木排又连在一起，用大竹筏固定在沙溪河的两岸。一座飞越沙溪河的简易浮桥在一夜间就架设成功。次日清晨，红军大部队如天兵神将顺利通过沙溪河，跳出包围圈向明溪进发。

勤劳勇敢的莘口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敞开胸怀吸纳四方移民，融合各族文化，逐渐创造了当地灿烂的内陆港口文化。舞龙、舞狮、划龙舟，京剧、越剧、高甲戏等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由于内陆港口的辐射作用，附近相邻的八九个县城的货物都来此中转，本地的笋干、冬笋、木材、毛竹、香菇、红菇、花生、茶叶、茶油，还有明溪肉脯干、连城地瓜干、长汀豆腐干、清流豆腐皮特别是茶油和笋干，远销上海和东南亚一带。商业的繁荣，带动文化的发展，公众的节日渐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大节日，每五天就有一个圩场，而圩场的热闹不亚于过节。

今天的莘口镇，森林茂密，生态优美，在保持传统产业的同时，兴建工业园区，木竹加工、水力发电、冶金机械铸造等三大特色工业产业的蓬勃发展，为莘口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守望那片海

吴 晟

400年后，我来了，穿过缓缓江流攘攘街声，停车。在小孤山旁，石阶斜斜向上伸，伸入苔藓覆盖下的历史。山门前的石壁上，攀爬的榕树根须纵横交错，繁密如二维码，目光一扫，隐约可见它的前世。

那时，先有桥，在福清南门外，始建于宋朝的桥，却直通向明朝的县衙，为堪輿所忌，时人皆谓应移建他处。当地学者叶朝荣为此周旋而未果，就连他的儿子，内阁首辅叶向高，也忧于经费人力，不敢贸然动工。后来，叶相之子叶



成学着手募集善款，率父老向县令凌汉翀建言获准，县令也捐出自己的俸禄，遂动工移桥，并改木为石，修成龙江上游第一桥，故名龙首桥。此后每逢元宵佳节，众乡亲皆盛装过桥以示吉利，尤其新婚夫妇，喜欢携手过桥，同心祈福，风尚渐成习俗，“利桥”美名，遐迩流传。

与修桥同年，即1606年，为“补龙江地势之旷”，“点缀融城风景之不足”，需建塔以代文峰，于是，一个班子，两个项目，十载工期。史料还记录了一个名字，名匠李邦达，由他负责设计与施工。建塔所需的优质花岗岩，采自龙江入海口的石山，以船运输，潮起潮落，帆去石回。塔身要那么高，石材是那么重，且层层递进节节高升，直到登峰造极，这都怎么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垒土成坡，每造一层塔身，就垒高周边地势，以便材料沿坡而上，坡与塔适时等高，当建到第七级时，所垒起的土坡，已经绵延到好几里



瑞云塔旧影

外的村庄。竣工时，再层层退土，把裹着塔身浸着汗水的泥土，通通卸下，如笋剥壳，如月出山，亮出干净的真身，在天地之间，在江波之上。

相传卜基之日，有五彩祥云，从太保山飘来，覆盖其上，神奇祥瑞，瑞云塔因此得名。叶



龙首桥



瑞云塔



每一个檐角都端坐一尊镇塔将军



瑞云塔塔座

向高更为之喝彩：“此殆山川之灵与千百年之运气，萃于一时，故能襄此盛举。”

历史常有得意之作，也往往留下叹息。就在瑞云塔完工前一年，叶成学不幸病逝，来不及看一眼自己心心念念的作品，常引后人感伤。我们瞻仰杰作，也是在怀念作者，怀念那些造福苍生的先贤，其功如桥，其寿如塔。

绕过一排榕树转过一弯石径，久誉“精丽甲于海内”的“南天玉柱”，赫然入眼。八角横空，

檐角微翘，七层到顶，层层收分。我们离塔身太近，仰望不到塔尖，那至高处应是葫芦状塔刹。目光沿檐角顺降，只见每一个檐角都端坐一尊镇塔将军，共56尊。第一层朝北处，开一扇较大的门，分列一对石雕金刚护法，披坚执锐，威严雄伟。在这么多将军的眼皮底下，我恭敬合掌。

沿着塔座顺时针绕塔。塔座应叫“须弥座”，典出佛经所说“须弥山”，上下宽中间细。细看须弥座束腰处的石雕，精美绝伦，当初那铁

石交锋的线条，晒过明朝烈日刮过清代长风，再经民国的烟雨密密洗涤，入目流畅，触手沧桑。再读石雕内容，上枱刻满三重瓣的仰莲纹，下枱雕着波浪纹，两道饰纹之间，是成双成对的生动图腾，有双狮戏球、双马奔涛、双凤朝阳、双鹿灵芝、双兔望月等，这些独具魅力的福文化符号，千古流传，历久弥新。望云，似在浮动，看马，如有蹄声。更引我注目的是转角处，各有一位造型可爱的力士，手握海螺照天吹，吹来海风阵阵，仿佛提醒游人，举步之间，即见沧海。

我们绕到塔的北门，沿着缝隙长草的石阶，拾级而上。塔门正上方高悬一方匾额，四字竖排行楷——“凌霄玉柱”，不知出自谁之手笔。叶向高？他的书法作品，我倒读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一副对联，在福州林阳寺的梅花园里，“安知住世君非佛，想必前生我亦僧。”览其生平可知，叶



塔门正上方的“凌霄玉柱”匾额

相也信佛，这副对联就完美传递出“六道轮回”和“乘愿再来”的佛学道理，又同时出示“众生皆是佛，唯我是凡夫”的崇高识见和谦卑姿态。14个汉字，绝色如梅！

信佛的叶向高与西方传教士也交往颇深，和利马窦更是手谈好友，后者在《利马窦中国札记》中介绍了当时风行华夏的围棋，据说这是西方迄今能找到的围棋来自中国的最早记录。利氏还为中国朝廷绘制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輿地全图》，在明神宗的书案上，中国人第一次“俯瞰全球”，看到大明天下仅有巴掌之大，叶向高惊讶不已。利马窦临终时，希望能安葬京城。依当时惯例，外国传教士去世都葬于澳门，不少官员就以此否决申请，而叶向高力排众议，认为都不说别的，单凭利氏翻译《几何原理》一书，朝廷也该赐地安葬。遂如愿，利马窦成为永久留在北京的第一位国际友人。后来叶向高又邀请“西来孔子”艾儒略来到福州传教讲学，并与闽中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对话，史称“三山论学”。透过这些政余之事，不难看出这位福清子弟被万顷波涛培养出的开放胸襟。

“我们登上去吧！”有同行者身手矫健，话音还在门外，人已到塔心。我们也随即入门，第一感觉就是瞬间清凉，一石之隔，外面是酷暑，塔内已深秋。这种塔内穿心、壁内折上的设计，既方便登临，又隔热纳凉，每层的出口与入口，自成“风洞”。刚过“火焰山”的我们，自然舍不得移步，但带声的风，不停地催人向上。每层



福清民众于中秋节这一天，在瑞云塔上结彩点灯，以示庆贺

塔心中转台壁前设有佛龛，供奉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壁上还有罗汉和飞天雕像，神态祥和，衣袂舒卷，卷成风的形状。

每跃上一层，必经塔心出口，绕过勾栏平座，再由同层入口而向上，进进出出御风而行，里里外外风华尽览。每层塔身外壁也都雕刻罗汉飞天、麒麟凤凰、天马仙鹤等图案，线条若隐若现，姿态优美传神，令人啧啧连声。

不久前，文博专家曾江老师送我一本他著述的《福建古塔》，书中援引德国学者艾克对瑞云塔的一段评述：“我们缘梯登塔，心中充满了明代末年的回忆，我们层层上升，渐能看见塔身外面小龛里的雕像，和尚、罗汉等等，都是近代毁像

主义下的幸存者。常人对于明代雕刻之偏见，以为呆板而乏创造者，等到细看这些作品，不由得惊诧重生。”翻译这段文字的是建筑大家梁思成。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也曾到此观塔，他说：“余足迹遍海内，历观名胜古迹，浮屠之精者，无过瑞云。”丁先生有“现代徐霞客”之誉，东西方学者皆如是说，我如是信。

很快，我们登到最高层，越高则回廊越窄，栏杆越矮，若是恐高者，只好贴塔身而轻移步。脚下的石板严丝合缝，却封不住小草纤弱的身影，看样子是马唐草，有明目之功，细长的嫩叶随风，像大士手执的杨柳枝。登高正好眺远，且宜吟诗。“凭高欲远苍茫望，烟火万家荔子新。”这是明人的歌咏。“潮涌湖平龙跃浪，风吹旌动马超群。”这是清诗在接力。而我，我的目光在翻阅龙江两岸连绵的画卷，几千楼宇之外是几万朵白云，哪一朵云下，是当年的太保山？母亲河在现代建筑的丛丛簇拥中，蜿蜒东去，江海交接在我目光的迷蒙地带，白鹭和轻鸥，在那里并秀温柔，小精灵做证，立塔初年，海禁已经解除，海上丝路，有丝滑的故事，也必有颠簸的情节。

在历史的记忆中，立塔之后，每逢甲子中秋，必点亮层层塔灯，父老乡亲彼此送福，共同祝福，这温暖的习俗传承至今。

风雨荷园

鹿野

1

1920年，一家名为“乾和号”的染布店在福清利桥的小桥街开张了。当家的男人姓周，名荷衢，原来居住在福清城南门外松潭村，后来又迁至倪埔村。我们要记住这两个村庄的名字，在后来波澜起伏的故事当中，这两个村庄的名字会再

次出现，在周家陷入绝境的时刻，这两个村的乡亲们会出手帮他渡过劫难。

今天的年轻人估计很难理解染布店是什么样的存在，在过去百余年物资匮乏的时代，穷人添置一件衣服都是一件大事，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做客或重要日子才穿它。而用血光蓝粗布做成的外套，膝盖、手肘部位又很容易褪色变旧，于是就有专门从事衣物染色翻新的店家。



修缮前的荷园

染布这一行当，在当时的福清也有很大的需求。市民把需要染色翻新的衣物送到染布店，店里师傅就根据顾客的要求染上颜色（多数为蓝、黑两种），把衣物分类、称重、定好价钱，与顾客谈妥后，收定金、约好取货日期，到时取回。取回家后，再漂洗数遍，一件旧衣就变成新衣了。

染布的工作很辛苦，既要保证染色的质量，又要做到不浪费染料，染衣师傅手拿木棍，冒着热腾腾的蒸汽，忍受难闻的气味，不停地用木棍搅动、绞干，再用清水漂净、晒干，交还顾客。

周荷衢的孩子当中，老三周昌盛对印染技术特别精通，当时普遍使用的“人丹士林”蓝布他能辨别出40多种颜色，令同行叹服。周家就是凭借这样出色的专业技术，加上交际、经商的综合能力，在同行当中突显出来。靠着这个染布店，周家积累了第一笔财富，于是开始扩张，同时做起了商品批发，甚至开起了钱庄，取名“乾和号”。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语，周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属于周家的风雨50年开始了。

2

如果世事安稳，周家生意仍保持着这样蓬勃发展的势头，那是一个小康之家发家致富的励志故事，但是天时不利，正在周家的家族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兵祸不期而至。

20世纪30年代，混乱的军阀割据不仅让偌大的中国动荡不安，也影响到了东南沿海的福清

小城。

“林靖部”——年轻的福清人或许完全不明白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但稍微上年纪的福清人对这个称呼一定会萌发天然的恨意，他们一定在老一辈的口中听到过这支军匪的恶行。

1931年，福建省防军第三旅旅长、福建第八防区剿匪指挥官、莆仙善后处处长何显祖为了要统一莆仙，与省保安处商量，委任林靖为省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令其所部开赴福清接受改编并驻防。于是林靖部3000官兵于1931年10月，全部开拔抵达福清境内。

林靖部到福清县后擅立田亩捐、房捐、灶捐、赌捐、营业税等名目，开放烟赌，包庇花会，到处设立捐局、税所，横征暴敛。他们借口取缔私商发行的票币，限所有私人发行的商票要在10日内收回，借此勒索敲诈当地的商号票号。有商家稍迟缴纳，即被私刑吊打。全县有30多家票商，包括周家的“乾和号”被洗劫一空，无法兑现私营钞票，陷入破产危机。众多依靠票商贷款经营的小商小贩，也相继闭门歇业。

不仅如此，保安团还以剿匪名义到各村镇骚扰，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小桥村”奸掠事件，这让福清各村镇百姓人人自危，民不聊生。福清社会各阶层集体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一致要求驱逐林靖部，此后爆发了福清历史上著名的“龙高民变”。当年厦门出版的《江声报》曾以“福清匪军奸淫掳掠高山镇，激起民变，围剿林靖部两营”为标题报道过此次民变。声势浩大的驱林斗



荷园主楼

争震动了当时国民省政府，最后以林靖部撤出福清结束，但由此牺牲了不少英勇的福清义士，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不小的负担。1934年，作恶多端的林靖在泉州被执行枪决。

这是一场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反抗军阀的运动，作为商人的周家自然要出钱出力。在这场兵祸当中，福清商界一开始被林靖部以各种名义勒索敲诈，后来又出资支持民变购买装备、抚恤牺牲者，还要出钱安抚驱林的军事势力，整个商界元气大伤，周家多年积累的财富也几乎被掏空。更令家人不能承受的是，周家老大老二都在这场兵祸中死于非命，周家老爷子经历了情感与思想的阵痛，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远走他乡，赴海外发展。

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村子的乡亲们向周家伸出了援手。在印尼的倪埔、松潭众亲友做

会支持周家，筹集的资金让周家全部兑现了钱庄私营债券，并凑足了一笔启动资金，让周家在印尼重整旗鼓。

他们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靠打工、染布谋生，周家第二代尤其老三周昌盛继承了父亲周荷衢拼搏吃苦的精神，每日肩背布匹奔走在城市乡间贩卖，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用赚来的血汗钱开了一家南洋旅社，接待来往印尼的乡亲，帮忙办理出洋事务等。在印尼苦心经营了6年之后的1936年，周家在兵乱中丧失的财富终于又慢慢积累起来。他们秉承福清人赚钱回乡起大厝的观念，在老家福清的利桥街口，买下10亩地，由留守家乡的老五周伟谟主持修建荷园东楼。

东楼为砖石土木结构平房，前墙红砖砌就，其他三面均为白墙，屋顶为四方形，即由四面等腰三角形筑成，内设10个房间，作为居住房。南边建一座较小的红砖平房，作为厨房、餐厅和储藏室，还挖了一口水井。庭院中种植了南洋佳木，整个荷园有鲜明的南洋风格，是福清利桥具有代表性的侨厝建筑。

由于在印尼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家不但还清欠债，且在福清小桥街染布店隔壁开了洋灰（水泥）店和木器（棺木）店，两店均在店后起盖三层楼房。在印尼打拼的周昌盛，又带领弟侄经营起“集大侨汇庄”，为在印尼谋生的乡亲汇款回家提供方便。但是到1938年底，日军飞机轰炸福清，将两座店铺看成碉堡，投下两枚炸弹将其炸为废墟。周氏一大家子几十口人都涌回荷园，一

层的平房东楼住不下了，就在南面匆忙建了一座二层楼房供家人居住。当时由于处在战乱时期，生意停止，侨汇中断，几无收入，周家男女纷纷脱下戒指、耳环、手镯、项链等金玉装饰品，变卖成现金，竭力建起了这座白色土墙的楼房。

3

如同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家族小说，周家的命运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折。国内战乱造成的伤害稍稍平息，在印尼的生意又再次陷入危机。1942年3月，日军攻占印尼雅加达，大肆烧杀抢掠，抓捕和迫害华侨。当地生意做不下去且连生命都受到威胁，许多福清籍的印尼华侨只得带着家眷返回家乡。周家老三周昌盛也跟着回国，并变卖了小桥街三处商铺，将事业重心转至省城福州。

周昌盛先是在福州下杭街金元巷开了一家批发商行。由于生意往来，结识了福州英资怡和公司总经理刘云楷并结拜为兄弟。在刘云楷的支持下，周昌盛在福州设立“集大侨汇庄”总行、福清分行以及福州十邑各县派送处，为印尼的“集大侨汇庄”派送十邑同乡侨汇，进一步拓展了业务范围和经济实力。1948年，周昌盛又涉足香港航运生意，事业不断扩大。为安置来港亲友，他还在香港干诺道开了一家“聚春园”酒楼。

周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福州市最早一家的榕、港合作企业是当时福州市照相行业中规模最大的艺光照相馆，

据说也是由周家后人周清先生牵线促成。位于八一七北路的艺光照相馆，是最早在福州市推出彩色婚纱摄影服务的照相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多数人还是拍一张两人半身照作为结婚纪念时，艺光照相馆已经在店内准备了十多套白色婚纱和西式晚礼服供新人拍摄，且还为新人提供化妆师、发型师。那一时期在艺光拍一张婚纱照的价格约为15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但也吸引了不少爱美的时尚人士，愿意掏钱为人生的重要时刻留下难忘记忆。

生意走上正轨的周家秉持福清人扶助乡亲、热心公益的传统，出资开辟了福清至福州的公路交通线，即福厦路相思岭路段。公路于1948年底通车。周家还买了一辆美制道奇牌汽车载客往来。1950年，周家老太太大寿，周家将寿诞的贺金捐出，为福清华侨中学建造办公楼。而当初在龙高事变时期资助过他们的倪埔村、松潭村乡亲也始终未曾忘记，周家出资在两村之间建起一座桥，名为荷园桥，亦是以周老先生周荷衢名字记之。改革开放初期，周家为支持图书馆建设，还向福清市图书馆捐款20万元。

4

和许多向外求索打拼的家族一样，大时代里周家几代人奋斗、积累，时运来了，努力向上；遇到战争、灾祸难逃毁灭，又在废墟中保留着一点星火，等待时运相济时重新燃起——但凡经历

过这些风风雨雨的福清人都能从周家的创业史中找寻到自己家族的影子。

2019年福清利桥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启动，周家的荷园作为重点项目也经历了从旧到新的蜕变过程。因为周家后人大多散居海外，荷园老宅内多年无人居住，木质梁柱被虫害雨水侵蚀，青瓦屋顶任风吹雨打破败不堪。两个多月的修缮，较好地恢复了荷园早期的样貌。



荷园修缮后的新貌

工匠们采用墩接方法，将糟配部分截除，换新材料，柱子以上的梁枋檩条进行加固；为了能换除破损的红砖，匠人们按照原来墙体砖块的形制、尺寸、色泽烧制新砖；年代久远的小青瓦、底瓦、盖瓦、瓦头重新铺盖，严格按照规制衔接；将原来的木质百叶窗进行防虫和加固处理，为老厝注入新的生命力。

如今的荷园伫立在利桥街的入口处。阳光下红墙白廊蓝窗，四面等腰三角形围合的屋顶与利桥周边风格各异的现代建筑相映成趣，庭院当中初建时所植的桂树亭亭如盖，见证了这所侨厝的热闹与冷清。

整个利桥古街经过改造，也由过去的码头、居民区变成了集商业、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街，人们游览重纶牌坊、瑞云塔，向革命纪念碑致敬的同时，总会在这座民国时期南洋风

格的老厝充满好奇。虽然暂时还未对外开放，但是游人总忍不住在门口向内张望，想要一探这老园子的秘密。

“荷园”取自周家创业第一代男主人周荷衢之名，这是一个有些文化底蕴的名字。一个男性的名字里为何会带个荷字呢？不知他的父辈祖辈寄予了什么样的人生期许。曾经盛开的夏日荷园，满塘欣欣向荣的娇艳与热烈，但冬日的枯荷也是另一种风景，只有经历风雨的人才能从中观照出繁复的人生况味。如同季节交替中的荷塘，荷园正在迎来新一轮的热闹与繁盛。作为利桥街古街改造当中重要的侨厝景观，静立的荷园是一座无声的侨商博物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奋斗的遗迹，向人们诉说着大时代里普通人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在罗源行医卅余载的顾玛丽医生

张兆浩



顾玛丽

顾玛丽，18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伊斯特本厄普顿庄园贵族之家，父为英王御前官员，勋爵。1897年，她毕业于英国医科高等学校，有伦敦药剂师协会的医学和外科执照，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做全科医生。

她正当青春蓬勃时期，加入英国圣公会传教团。1898年圣公会派她前往中国福建罗源凤坂村，其姐先她到达该村传道。1870年3月，福州教区何会督莅临罗源视察时，便倡议医院，但1883年，圣公会才正式着令顾玛丽的姐姐等人在凤坂村创办安立甘（Anglican，意为“英国圣公会”）诊所。顾师姑自己虽然也算是医生，但只对白内障摘除有专攻，所以诊所还是无法设立。

1897年顾玛丽从医科大学毕业那年，福建圣公会请求英国圣公会派人来罗源。1898年夏，顾玛丽来到罗源凤坂，先在凤坂村熟悉民情，学习罗源方言，也深入农民家庭治病，开始创立安立甘诊所。

安立甘诊所于1899年迁入县城，先在城关赁屋设诊。凤坂民众也离不开顾玛丽，她只好两

头兼顾。就在这年5月英国圣公会批准资助罗源建立基督教医院。款项到后，购买了司后巷与后园里之间的几座民房、园地，改建成女馆，专治女病人。初创时期医疗设备简陋，病床也少，到1910年增设男馆，罗源县圣公会基督教医院（俗称圣教医院）才正式成立，隶属福建教区罗源支区，领受英国教会的津贴。顾玛利被委任为院长，她的手下有1个助手、3个圣经女宣讲员、8个基督教师、3个护士及1个帮工。

顾玛丽在罗源城关开始行医兼传教。一段时间后，她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发表在英国圣公会主办的《印度的妇女和中国的女儿们》上。她写道：

我们的小医院有一个小侧翼，从一角分出两个房间，楼上有一个阳光明媚的阳台，楼下有一间药房和候诊室。新的药房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房间，我们现在很快就轻松地完成了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四十张病床似乎还没有满，而我们今晚只有十八个住院病人，我们不得不开始祈祷能有更多的病人，因为我们不喜欢懈怠，更不喜欢过度劳累！今年，我们还失去了女医生 Daik Hok，因为我们诚实地把她送回了福州，并聘请了一位新助理，名叫吉杜昂，她是一位牧师的女



罗源县城旧影

儿；她在古田学校接受教育，并希望成为一名医学生。她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姑娘。我们急需一个护士来代替兰姆小姐，送来的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我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我在早晨时间不得不到外面的药房工作。我想，如果我们能多一位医生，我们就能放个假。我不得不放弃巡诊和访问村子的药店，而长时间待在医院。好在护士们是那么可靠，这样我可以在周六到周一，到一个未传教的村子，待在一个病人的家中，在周日召集一些村民做礼拜……

医院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政府实行戒烟和禁烟。政府下了决心打击抽鸦片行为。然而，尽管当局发出通告，来医院戒烟的每人可以得到50美分的资助，但在第一学期戒烟班上，医院并没

能招收到太多人来戒毒，有的人甚至为抽烟者呼吁说，如果没有鸦片，他们就会死。

顾玛丽与戒烟者在一起度过了一周时间，成功帮助了 30 个人戒烟，其中不乏三四十年的烟龄的人。

医院还承担治疗麻风病的事务。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方言呼为“痼老”“病腿”。1920 年 8 月，罗源县基督教医院在养济院旁修建一间传教堂，约 120 平方米，每周定期由顾玛丽等女医生、师姑到场传道兼对病人布施医药和食品。所需药品和经费由英国伦敦万国麻风病救济会、美国纽约麻风病救济会通过闽北基督教麻风病协会供给。

二

顾玛丽除了给人治病和传道外，还勤于动笔，在《印度的妇女和中国的女儿们》上发表文章。

英国圣公会女部刊物《印度妇女和中国的女儿们》的英文版由 SPCK 出版。SPCK 是英国最早的宗教书籍出版商之一。顾玛丽的文章全都刊登在这家杂志上。但是她只是记录工作的过程，至于典型病例的诊治和效果，较少提到。对于在医务之外做的好事，更是三缄其口。

但顾玛丽仁心仁术众所周知。据廖翠娟侄女陈琴女士回忆，当年廖翠娟肚子剧

痛，请遍医生，无法解决，其父赴榕抓药，遇台风无法返家，后家人夤夜延医，顾玛丽冒大雨，提灯笼出诊，廖只服一枚药片，翌日病愈。孝巷街刘长长幼失父母，体弱多病，顾玛丽为其免费治疗，出院时还以一套新衣相赠。

吴锦伊先生的《顾玛丽在罗源行医 40 年》中记载了很多顾玛丽的善行：岭头村张明铸妻难产，经顾玛丽动手术后，顺利分娩，顾玛丽恤其困厄，分文不取。司前街林庄庄年 50 岁，患“臌胀”已濒晚期，顾玛丽出于爱心，每周为其抽腹水一两次，还免费提供营养品，至病妇坚持出院方作罢。更难能可贵的是松山岐后黄金旺妻患疔疮，溃烂流脓，百般疼痛，顾玛丽上门诊治，使其溃疡面收口。可长时间没长新皮，顾玛丽毅然剥离自己腿上皮肤移植，终使其痊愈。

她给罗源知县家眷看病，知县给了 200 美元的报酬，顾玛丽十分惊叹，认为“这对于我们医院来说是一笔极大的数字”，足以作为来年的一大



顾玛丽的工作照

笔开支。

顾玛丽还经常赈贫济困。岭头谢文钦的母亲得病，医治无效而亡。顾玛丽主动出资帮其葬母，被谢文钦视为“义娘”。司前街林妹妹患先天性聋哑，住院治疗无效，顾玛丽见其生活没有着落，便送福州聋哑学校就读兼学手艺。学成归来，仍难自给，顾玛丽每个月接济数块银圆。1926年驻扎井巷的粤军许崇智部队开拔后，广东顺德籍士兵许发明患关节炎，且满身疥疮糜烂，被遗弃而流落街头，顾玛丽将其收留入院免费治疗，出院后按月资助膳费并送其往东门黄升忠师傅处学裁缝手艺，后来还资助其娶亲成家……几十年间此类事情不胜枚举。

笔者没有看到《印度的妇女和中国的女儿》对她工作和品德的评价性文字，倒是在1931年福建圣公会主办的《福声》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说：“罗支（基督教支区）圣教女医馆之设立，历有年所，顾主理（指顾玛丽）之仁术，深得社会各界之欢迎，来医者有应接不暇之势（兼医男病），尝请大会派古师姑、邴医生来帮助，均不如意，以致忙无暇晷。尤难得者尤能热心布道，同护士等除理病外，或在馆内，或往乡下，借医术以寻亡羊，使其心身归主医治，罗支教会之维持深得其臂助。”

三

顾玛丽医生何时离开中国，退休返家，有不

同的说法。

吴锦伊先生在《顾玛丽在罗源行医40年》中写道：“1937年三四月间，顾玛丽年逾七十，告老回国。”

沈景英先生在《罗源县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史略》中写道：“1945年前抗战期间，顾玛丽等回英国。”

吴锦伊先生对地方文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沈景英先生是当时跟基督教医院相埒的罗源县卫生院院长，笔者认为沈景英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接近真相。顾玛丽在1934年7月曾回国休养，两年之中一直念念不忘罗源的医务，曾多次请求返罗源工作。1936年夏，她又再次请求。这可以《印度的妇女和中国的女儿们》中顾玛丽的文章和圣公会的报道为据：

《远方和附近的新闻——利克的全天工作会议》报道：去年，库珀（即顾玛丽）医生在利克演讲，因此将向罗源寄送一个包裹。今年，C. E. Z. M. S.（英格兰教会译纳纳传教士协会）从这项美好的事工中获得了大约两百件物品，包括医院使用的服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各种手术敷料和绷带数百个。

顾玛丽准备再回罗源行医前，发文写道：“如果任何读这篇文章的人有医学界的朋友想退休，他们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他们不再需要的医疗器械呢？请寄给我，地址是伦敦西区菲茨罗伊广场南安普顿街19/21号C. EZMS，或者寄到我家，地址：伊斯特本

厄普顿庄园 36 号。”

在伦敦，她还积极为罗源的医院筹募资金、用品，说：所有包裹都应寄到这个地址：Manor House, Leigh Road, Highbury, N. 5；请纪念运费基金提供的帮助。

《委员会说明》：1936 年 9 月 22 日周二举行了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由 Molony 主教主持。Florence Cooper（顾玛丽英文名）博士返回中国，在洛园（罗源）医院继续服务一段时间，这一决定得到批准。

1936 年夏天，顾玛丽已经 69 岁了，如果按吴锦伊老先生的说法，1937 年三四月间回国退休，实无必要。

但沈景英先生文中说她 1945 年“二战”期间回国，又没有明确哪一年。

终于看到一则 1946 年的英文材料，说：“库珀（顾玛丽）医生于 1898 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并被委任到福建教区的罗源医院，在那里度

过了她 41 年的传教生涯。”

很清楚，顾玛丽是 1939 年回到英国的，但 1939 年 9 月英国向德国宣战，跨国渡轮停止航行，顾玛丽应该是赶在英德交恶前到家。

这则材料的作者还说：“在 7 年前，她退休的时候，担任了伊斯特本协会的地方秘书，这一职位因她姐姐去世而空缺——布兰奇·库珀，她也曾在中国做过传教士。”以此推算，1946 年顾玛丽还健在，那时她已经 79 岁高龄了，仁者长寿。

顾玛丽终身未嫁，真正将人生的大部分都贡献给罗源的医疗和卫生事业！难怪当她离开罗源的时候，有许多人将她送到飞鸾再转宁德三都乘船回国。至于顾玛丽逝世的日期，目前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只能暂付阙如。

孙思邈说：“大医精诚。”此言完全可以概括顾玛丽的一生。



江户时代的“福州船”

刘洪哲

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日本宽政元年），一艘名叫“安利船”的中国船在从浙江乍浦前往日本贸易途中遭遇大风，经日本船“利德号”和“权限号”的护送，最终抵达日本长崎港。根据日本方面对“安利船”的调查情况，全船共有77人，其中航运工作人员65人。在这65人中，有61人是福州府人，占94%以上，按全船人数来计算，也占了85%。

福州人确实曾在江户时代的中日交通中独领风骚。江户时代前期，从福州前往日本的福州船数量曾多年位居唐船（日本将从中国出发的商船，包含少量从东南亚出发的商船称为“唐船”）中的第一位。即使江户时代中后期福州船数量有所下降，福州人仍然凭借着非凡的商业头脑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广泛经营着中日贸易，上述“安利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安利船”并不是从福州出发的，但又明显是一艘由福州人掌控的商船，其深层次原因，还得从江户时代遍及中日海路上的福州船说起。

一、日文“福州船”与中文“福船”之辨

“福州船”的概念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主要在日文史料中出现，中文史料则甚少提及。究其原因，在于中日双方对船只的命名方式不同。

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与中国、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并限制在长崎一地。每当唐船抵达长崎港后，长崎奉行所委派的唐通事便会登上唐船，对船上人员进行问询，检查船只的载货目录、乘船者名单等，将唐船的基本情况记录在案，并以“唐船风说书”的形式报告给长崎奉行。他们对进入长崎港的唐船按照每年入港顺序编号，以船只的起航地进行命名。如日本延宝三年（1675）第一艘到达长崎的唐船来自福州，即将此船记载为“一番福州船”。这就是“福州船”名字的原始出处。

因江户时代从福州前往日本的船只较多，所以日本方面关于“福州船”的档案史料也十分

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关于唐船记录最集中的史料《华夷变态》中，全书35卷，从第2卷（记事时间为1674年，日本延宝二年）开始出现唐船信息，其中第一条唐船记录即为“福州船”。不过第2卷在目录标题中只以“福州风说”“广东风说”“东宁风说”等呈现，正文中才有“福州船”“广东船”“东宁船”等信息。从第3卷开始，目录标题中就加上了“船”字，如“一番福州船ノ风说”“五番厦门船ノ风说”等。第4卷还收录《福州求硫磺于琉球书四通》，足见日文史料对研究福州海外贸易史的重要性。

除了文字，日本方面对“福州船”的记录还有图画。如日本宝永年间西川如见所著关于中日贸易的重要著作《增补华夷通商考》中，载有福

州船等唐船的图画，不但对“福州船”的样式有十分形象的刻画，而且对其结构、性能进行了分析。

江户时代，日本也允许荷兰人在长崎开展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长崎商馆的档案中也有“福州船”的相关记载，荷兰人关于“福州船”的定义与日本人是一致的。

中国方面关于船只的命名方式呈现多元化，有的侧重以船只的地域命名，如著名的“福船”“广船”，有的侧重以船的结构样式命名，如“鸟船”“沙船”。

“福船”一般是指由福建船匠所建造或使用福建造船工艺所建造的船只。早在宋元时期，福船即在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福船



《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的福州船图

大量出现在中文史籍则始于明代。明代福建造船场遍于沿海各地，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地官私造船业都很发达，所造海船工艺先进，装备精良。王在晋在《越镌》中云：“通番大船，势若飞城驾海，楼橹完固，兵械整严，贼不敢轻犯，商船惟闽有之。”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称：“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上，其旁皆护板，裊以茅竹，竖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为四层……”《明史兵志》亦云：“福船耐风涛，且御火……”可见福船性能优良，坚固可靠，既可用于商业运输，也可用于海上作战。

福建也是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宝船和琉球册封使所使用的封舟建造地，无论是宝船还是封舟，基本上都是按照福船的形式加以改造的。明清时期在福建沿海所造的还有白艚船、赶缙船、草撇船、横洋船等各类船只，这些都可归为福船系列。

如上所述，从本义上来说，“福州船”是以船只的起航地命名，“福船”则是以船只的建造地命名，这显示出中日双方在船只命名具体语境上的区别。

福州是福建最大的造船中心，“福州船”既然表示从福州出发的船只，其绝大部分在福州本地制造是没有疑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州船大多可归为福船系列。但是，福州船与福船的关系又不能如此简单地进行处理。随着中日贸易的

快速发展，在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方面出现了“沙船即所谓南京船，鸟船即现在所谓的福州船”的说法，而在江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唐船图”中，有2幅分别是福州造而发自南京的船、福州造而发自广东的船。这就使福州船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的延伸，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二、数量第一的福州船

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同意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商人在申请到票引后从漳州月港出海贸易。随着政策的施行，省城福州也有越来越多的商人突破海禁限制出海贸易。与闽南商人大多前往东南亚相比，福州商人的一大特点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并重，从国别上来看，又以去日本尤多。

因明代倭寇问题严重，明政府在隆庆元年（1567）调整政策的同时仍然严禁商人到日本贸易，但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福州商人采用各种办法前往日本。清初王胜时在《漫游纪略》中曾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可见从事对日贸易的盈利远多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另一方面，福州距日本较近，来往交通便利，“从福海中开洋，不十日直抵倭之支岛。如履平地，

一人得利，踵者相属，岁以夏出，以冬归，倭浮其值以售吾货。”

明代中后期以来，从福州前往日本的船只数量明显增多。万历年间福清人与长乐人联合，形成造船、把舵、水手、良匠、向导、通事等组织完整的海上船队，前往日本贸易。杨彦杰在《一六五〇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中提及：“1650年来港的70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有59艘，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

清初，清政府与郑氏集团在福建连年作战，福州属于双方争夺的拉锯地区，主要为清政府所控制。为限制郑氏集团的发展，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沿海地区实行严格的迁界政策。受其影响，在1674—1684年间，赴日的唐船数量平均每年只有20多艘，但此间福州仍持续有商船前往日本，在1675、1678这两年中福州船数量甚至排在各地赴日唐船中的第一位。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1684年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福州人前往日本又迎来一波高潮，其中重点体现在赴日福州船数量的暴增。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在中国实行开海贸易后的第一年即1685年，从福州前往长崎的船只数量即在所有唐船中排名第一。据统计，全年前往长崎的唐船共85艘，其中福州船21艘，厦门船20艘，南京船15艘，其他各地船只均在10艘以下。

1686—1687年，福州船的数量在唐船中继续排名第一。1688年是福州对日交流史上值得

大书特书的一年。全年前往长崎的唐船数量为194艘，其中福州船数量历史性增长至45艘，是1685年福州船数量的两倍以上，比排第二的宁波船31艘多出14艘之多。1688年也是江户时代有数据记载福州船和唐船前往长崎数量最多的一年。之后日本方面对唐船数量进行限制，所以福州船所创下的单年45艘地方船的记录在整个江户时代都未被打破。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自开海政策实施以来，赴长崎的福州船数量连续4年位于唐船的第一位，平均占比超过五分之一（若剔除从东南亚出发的船只，则超过四分之一）。正因为1688年唐船数量的暴增，日本当局决定从1689年起对抵达长崎船只的数量做出限制，限定每年赴长崎的唐船数量为70艘。具体分配指标为福州船13艘，南京船10艘，宁波船12艘，其余船均在10艘以下，说明日本方面也认识到福州船的数量在唐船中首屈一指，在分配指标上给予了最高的额度。

三、性能优良的福州船

江户时代中期以来，日方史料中福州船的数量明显减少，江浙地区的宁波船、南京船则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但福州船在中日贸易中的重要程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进一步提升。

成书于日本文化八年（1811）的《长崎古今集览》有以下一段论述：“沙船即所谓‘南京船’，

鸟船即现在所谓的‘福州船’。安永年间（1772-1780）沙船来航通商只有两艘，之后又来了两艘，遭遇风难而破损，此后再没有来。近年往来唐国国内的通商船只，有遇风浪偶然漂抵长崎的，也有漂抵九州萨摩（今鹿儿岛西部）、五岛（今长崎县离岛），皆被曳航到长崎的，这些多数如沙船样的小型船。福州船的形状见《增补华夷通商考》等书的记载，即该书的‘外国部’。但是，最近的鸟船和以前的船大不一样，现在每年都有进入港口的，所以不再详细记述。”

此段将福州船和南京船并列，其仍然带有以船只的起航地命名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福州船已经明显含有船舶结构样式的意思，将福州船与鸟船进行了绑定。更重要的是，文章明确表示，在江户时期中后期，来到长崎的唐船大部分都是鸟船（福州船），而沙船（南京船）只偶尔遭遇风浪才漂抵。在这里，福州船已经成为大部分来日唐船的统称，这显然已经超越了起航地的意涵。

鸟船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普遍用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其“头小身肥，船身長直，除设桅、篷外，两侧有槽二只，有风扬帆，无风摇槽，行驶灵活。而且槽长槽快，船行水上，有如飞鸟”，同时又因船体形态像鸟，故称“鸟船”。鸟船的主要特点是船底深尖，不惧风浪，航速较快，同时载重可达“数千石”，是开展中日贸易的主要船型。上文将福州船与鸟船进行绑定，固然不能说所有鸟船都是在福州制造，但可说明大部分来日唐船采用了福州地区造船工艺，以至样式和结构

上都与福州船相似。

无独有偶，在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中保存了一份有代表性的江户时代《唐船图》画卷，其中共有12幅画，画中依次为：南京船、扬帆行驶的宁波船、落帆停泊中的宁波船、福州造而发自南京的船（落帆停泊中）、台湾船、广东船、福州造而发自广东的船、广南船、厦门船、暹罗船、咬啮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发船、阿兰陀船。其中虽然没有福州船，却出现了福州造而发自南京的船和福州造而发自广东的船，说明南京和广东地区的船只不少是在福州建造的。

浙江也同样依赖福州造船技术和原料。《造修福船略说》云：“浙亦用福船耳。若浙中去闽造船，此固可为彼地张本也，如浙中自为造成，必往闽中买料。”此处虽然是讲福船，但其中提到的闽中显然指代的是福州地区。



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图·福州造而发自南京的船（落帆停泊中）》

福州是福建最大的河流——闽江的出海口。闽北各地被砍伐的松、杉、樟、楠等木材，分别沿建溪、富屯溪、沙溪汇集到延平，再由延平沿闽江源源不断顺流而下直达福州。汇集到福州的大量木材，为船只建造和维修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面向全国供货。

江户时代前往日本的唐船绝大部分是从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出发的，如上所述，这几个地方的船只或者在福州制造或者采用了福州造船工艺，可见日本方面关于“鸟船即现在所谓的福州船”的说法并不夸张。

若我们把视野再扩大，在松浦史料博物馆的《唐船图》的附录中，还有一个《外国船具图》，主要是将甲板上的船具，分别以写生的手法绘画出来。在其中又出现了“南京、宁波、台湾、厦门、广东、广南、咬啍吧发福州造火炮（图版 15）”“宁波、台湾、厦门、广东、广南、咬啍吧发福州造木碇（图版 15）”，“橹（图版 20）：宁波、台湾、厦门、广南、咬啍吧发福州造总长约 5 间”等内容，说明咬啍吧地区的船只也使用了福州所造的部件，可见福州造船工艺不仅影响中国东南沿海，而且远达荷兰所属的印度尼西亚群岛。

四、福州船与福州帮

与唐船的起航地相对应，明末清初赴日的中国人也大多来自福建、广东、浙江、江苏，这样

就以地缘为纽带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帮群。福建泉州、漳州地区的华侨组成了泉漳帮，福州地区的华侨组成了福州帮，广东地区的华侨组成了广东帮，浙江、江苏、江西等地区的华侨组成了三江帮。

1629 年，移居长崎的福州籍贸易商、船主、文人共同商议捐资，并邀请福州僧人超然东渡长崎，在圣寿山开基，创建崇福寺，成为福州籍华侨信仰、祭祀、联络及集宴之场所，具有传统的同乡会馆之功能，实现同一帮群组织的互助。

从船只数量来看，虽然自 1689 年起福州船在唐船中跌出了第一位，并呈逐步下降之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福州人在日本的式微。一方面江浙地区船只中仍然有不少是由福州人经营，即使是江浙人经营的船只也十分依赖福州籍航运人员的专业技术，另一方面福州人在几个重要指标上排名第一，甚至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

（一）在中日贸易中，由长崎奉行委派负责管理贸易相关事务的唐通事至关重要，他们大多由长崎的华侨担任，并呈现世袭制、家族制形态。根据日本学者宫田安《唐通事家系论考》中关于唐通事原籍的研究，可明确原籍的唐通事有 32 家，其中原籍福建的有 23 家，远超江苏、浙江等地。而福建 23 家中，福州府 12 家，此外漳州府 6 家，泉州府 4 家，延平府 1 家，说明在长崎的唐通事中福州籍最多，福州话也成为在长崎开设的唐通事学校中所使用的三种中国方言之

一。因唐通事往往在家族中世代传递，并与长崎奉行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可以说福州籍华侨在长崎的中日贸易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二）1602年，当时长崎唯一的佛教寺院——悟真寺为中国人建造了墓地，而后成为旅居长崎华侨华人的墓地。据统计，长崎悟真寺共保留有1627—1861年华侨华人墓地230座，其中来自福建的有150座，约占所有华侨华人墓总数的三分之二。从籍贯来看，福州府126座（闽县31座、侯官16座、福清县28座、长乐县42座，另外不明者9座），漳州府11座，泉州府10座，宁德府1座，汀州府1座，其他府1座。悟真寺不像后来四大帮群所兴建的“唐四寺”（即兴福寺，俗称南京寺；福济寺，俗称漳州寺，亦称泉州寺；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圣福寺，俗称广州寺）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其墓地占比对分析在日中国人祖籍地构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明末清初，赴日中国僧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当属福清籍的隐元禅师。隐元在赴日本之前，已经是名扬海内的高僧。隐元担任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第一任住持，从此他在这里弘扬佛法，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隐元侨居日本20年间，其法嗣弟子大多为中国僧侣。他们活跃在日本的宗教界，为黄檗宗

在日本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结论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没有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明清政府也不愿在朝贡体系外与日本发展关系，整个江户时代中日两国政府间并未建立正式关系。但是一艘艘从中国出发的唐船，将生丝、白糖、瓷器等中国产品运抵日本，同时将白银、铜、海产品等带回中国，加强了两国间的经贸联系，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的局面。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搭乘唐船来到日本，双方之间的交流逐步从物质层面深入思想文化层面。可以说，唐船是江户时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福州船是江户时代唐船的典范。江户前期福州船数量在唐船中长期位居前列，并曾连续多年占据第一位。福州造船技术在全国首屈一指，中国东南沿海多地都采用福州造船工艺，以至日本方面出现“鸟船即现在所谓的福州船”的说法，将福州船作为来日唐船的统称，对福州船的优良性能予以高度认可。福州船为江户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日民间交流的宝贵文化遗产。



徐葆光使团出使琉球记

郑训焄 郑松波

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藏有一幅《黄士龙诗述封琉球国行礼宴会事》长卷，描述的是清朝册封琉球国行礼宴会的景象。该卷长约10米，宽约50厘米，全卷共计219字，由黄士龙作，闻过庭书。诗卷整体磅礴大气，书精行草，笔力雄健。该长卷是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会长林文清在旅日侨胞协助下，从日本东京一古董店高价购得。

经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念家圣等人辨认，《黄士龙诗述封琉球国行礼宴会事》全文为：

版宇天王地，恩波使者舟。

藐孤（是时琉球国王新主使其臣来请

命献称曰孤）承世土（中山世土匾额本朝所赐），宠诰贵遐陬。

峰抱三分势，城临万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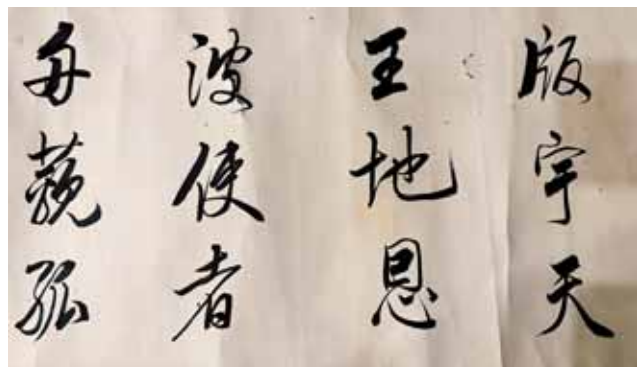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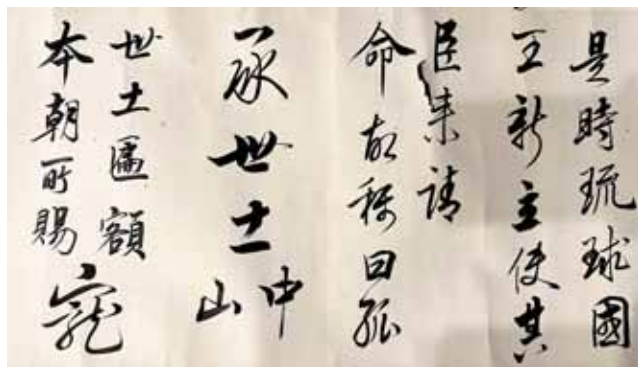
甲旌欢会集，與高奉神留（欢会王城第一门，名神奉，正殿门名）。扇影香风举，栖霞锦袖浮。

拜承鸾鹊诏，捧上凤皇楼（正殿有藏诏之所）。

对越衣裳肃，趋陪礼数周。

解知华国语，供得大官羞。

户缀蛟绡网，帘褰翡翠钩。



《黄士龙诗述封琉球国行礼宴会事》局部

画屏金縷裹，宫举玉雕鞍。
舞弱春多熊，影长暖未收。
高台博望苑，箫鼓上黄雀。
畏歟陈仙署，明妆街绮帟。
地纪连瀛岛，天文接斗牛。
龙光荷休锡，长此翊神州。

右黄士龙诗述封琉球国行礼宴会事也，
过庭闻诗。（念家圣老师谦言，辨认该文还
存在差错，敬请方家指点改正）

文中“中山世土匾额本朝所赐”指的是琉球
王国首里城的正殿上挂着的“中山世土”匾额，
为康熙皇帝御赐，可见当时琉球和中国的关系十
分密切。

关于黄士龙曾到琉球一事，周煌《琉球国志
略》收录的徐葆光《游山南记》这篇文献提道：
“那霸江以南，皆故时山南王地也。自迎恩亭渡，
沿江有村，曰垣花。左带南炮台，抵海；右翼小
禄，迤连丰见城。村中米廩数区，屋茅荫树，一
径南出道仪，见山高不数仞，可骑而越也。己亥
十一月二十一日，偕紫金大夫蔡温、都通事红士
显、从客翁长祚、黄士龙、吴份、弟曾光等上下
骑从百余人，渡江截山而南。”

由此可见，黄士龙是以“从客”身份随册封
使团赴琉球。

《琉球国志略》共有16卷，主要记载琉球
国的历史和地理概况。全书依序有总目、凡例、
采用书目、首卷及正文。首卷包括御书、诏敕、
谕祭文和图绘。御书辑录圣祖、世宗、高宗亲笔



《琉球国志略》

书赐琉球国王的匾额。诏敕辑录世祖、圣祖、高
宗给琉球国王的诏书。谕祭文辑录圣祖、高宗为
琉球国有关的丧事或祭事谕写的祭文。图绘包括
琉球星野图、琉球国全图、琉球国地图、王府
图、先王庙图、天使馆图、球阳八景图、封舟
图、玻璃漏图、罗星图和针路图。

收录于《琉球国志略》的《游山南记》，作
者徐葆光，苏州长洲人，字亮直，清康熙四十四
年（1705）康熙第五次下江南时，以秀才的身份
献诗，被召至京城，三年后考中举人，再过四年
后参加会试，后被钦赐参加殿试，考中第三名，
也就是探花，被授予编修的职务。

1718年，徐葆光奉旨担任册封琉球的副使，
被赐予正一品麒麟服。明清两代，琉球为中国藩
属。每次琉球国王更迭，中国皇帝例派使节去祭
奠，然后册封新王。册封使代表的是皇帝，当时
朝廷要选“学问优长，仪度修伟”者充任。汪士

铨在为《中山传信录》写的序言中称徐葆光“以文章华国，以政事经邦，而且仪容端伟，言辞敏妙”。《清史列传》卷七十一也称“葆光才品为馆阁冠”，是一位理想的外交官人选。

康熙五十八年（1719），徐葆光经康熙允准为母亲庆祝七十寿辰并在家乡苏州过春节。节后，二月十二日向福建福州进发。

福州鼓山灵源洞现存有“徐葆光题名”摩崖石刻一方，曰：“康熙己亥，长洲徐葆光亮直以使事至闽。四月之望，偕弟尊光日暄、昆山黄士龙、晋江王观涛溶卿、僧常荣、载月、得人同游。”这方题刻记载了徐葆光等人在出使琉球之前驻足福州的经历，也是现存最早的黄士龙赴琉相关文献记载，与后来黄士龙诗述封琉球国行礼宴会事，可以前后印证黄士龙是随徐葆光使团出使琉球。

五月二十二日出五虎门放洋，徐葆光和册封琉球正使海宝一起前往琉球。这一次出使真正在琉球的时间仅8个月，往返海路却有5400里。

按照传统，册封使除了要在册封大典上宣读御诏，还要代表康熙帝御赐给琉球国王尚敬食物，在册封典礼上设宴。徐葆光使团携带四名厨师、一名糕点师和若干杂役，并设“理宴司，掌七宴之事；掌牲所，掌羊、猪、鸡、鸭支送；供应所，掌酒、米、小菜支送。”

300年后，苏州吴门人家根据康熙册封琉球国王的菜单，复原了整套清册封宴，并在冲绳那霸市原来的王宫向民众展示。而这一值得纪念的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

成果，被印制成“吴门人家册封宴”个性化邮票一套，方寸之间见证历史。

就是在这场册封典礼宴会上，作为“从客”身份的黄士龙，目睹整个流程并吟诗记述了当时封琉球国行礼宴会事。而书写下这首长诗的闻诗，字过庭，江苏江阴人，是一名书法家，有楹联存世。至于闻诗是否也是“从客”，未见史料载及，留待进一步查考。

册封宴后，在琉球的8个月期间，徐葆光与当地人士广泛交流、友好交往，为传播中国儒学、书法、汉诗和茶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留下了16件书法，其中有9块匾额、4对楹联，如文庙书“明伦堂”匾，天妃宫楹联：“那霸唐营，并峙两官分上下；夏来冬往，安流二至合华彝。”还有为文庙书《琉球国学碑铭》和为王府书《孝经》，在康熙己亥冬至所书“中山第一”石碑至今



徐葆光题“中山第一”石碑

仍立在琉球王府（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内瑞泉门前。

同时徐葆光把此次琉球之行当作自己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从接受册封使命到归国，都以诗文记录行程，写下诗歌有 417 首之多，分为《舶前集》《舶中集》《舶后集》三卷，后结集命名《海舶集》。

而在徐葆光回国后写的《中山传信录》中，“中山赠送诗文篇”也收录了琉球国君、士大夫、僧侣等人的汉诗，其中和徐葆光交往的占相当一部分。琉球国王尚敬曾作诗：“只饮山头一勺泉，灵槎攀挽易经年。八分墨彩留屏障，展对如亲绛阙仙。”述说徐葆光在琉球大半年，只接受每天送去的瑞泉水（琉球王府在山上，内有泉源名“瑞泉”），册封仪式后中山王赠白银 192 两，被徐葆光当场谢辞。

现在冲绳不仅有徐葆光像，各类研究徐葆光及其著作的社团也层出不穷。2003 年，徐葆光诗集重新整理出版后，冲绳掀起了徐葆光热。两年后，“徐葆光纪念事业期成会”成立。

明清两代向琉球共派出 24 次册封使，共计 45 位正副册封使。留有著作的正副使共有 18 人，其中最具史料价值的就是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及其后周煌《琉球国志略》和李鼎元《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是第一部详细介绍琉球的志书式典籍，也是了解琉球历史和中琉关系史最权威的经典。它全面记述了当时琉球社会历史风貌、琉球国王朝世系、官制及氏族状况、自然景观、物产以及文化教育、习俗、宗教、日常生活等内容。

徐葆光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以前人们对中国到琉球的航线，以及对琉球的地理、历史、国情等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自序中写道：“遍游山川海间，远近形势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礼仪，观风问俗，下至一物异状必询名，以得其实，见闻互证，与之往复，去疑存信。”

更为重要的是，《中山传信录》附有徐葆光领导测绘的中琉海疆图，图中琉球王国最西南的疆域只到八重山，而钓鱼岛、黄崦岛、赤崦岛等均在中国海疆内，钓鱼岛归属问题不言自明。这本书后来备受推崇，日本于明治三年（1766）即翻刻出版。1781 年，法国巴黎也有了翻刻本。

见于徐葆光《游山南记》记载的还有紫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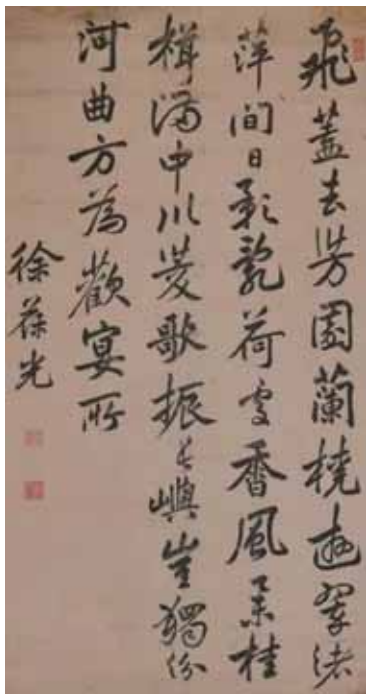
夫蔡温、都通事红士显、从客翁长祚、黄士龙、吴份、弟曾光等人。

蔡温（1682—1762），字文若，号鲁齐，和名具志头亲方文若，童名真蒲户，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儒者。根据《蔡氏家谱》记载，蔡温一族的元祖名叫蔡崇（字升亭），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是宋朝端明殿大学士蔡襄的后代。明朝初年，蔡崇奉命迁居琉球，成为闽人三十六姓中蔡姓的始祖。

蔡温是蔡崇的十一世孙，曾任协理府总理司、紫金大夫，加授法司品衔。蔡温在出任琉球三司官期间，对琉球的山川进行梳理，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山林的政策，以及鼓励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方针，使琉球王府的财政收入大为提高。此外，蔡温还制定了《位阶定》，对琉球的政治制度和位阶制度进行改革。蔡温被冲绳学学者伊波普猷列为琉球五伟人之一，至今仍受人尊崇。

徐葆光使团另一名“从客”——翁长祚，曾在《中山传信录》后序中称：“余随封逾年，太史采风，幸附搜讨……览是编者于圣朝风教之远，不已略见其一斑矣乎！”由此可见，作为徐葆光从客的翁长祚，一直追随徐葆光在琉球的采风活动，并有所补益，为徐葆光在琉球期间的勘测调查、搜集史料、整理考订、编摩成帙，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清代册封琉球使团之从客，同正、副册封琉球使一样，在中琉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既是外交的使者，又是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与践行者。



徐葆光与琉球文人结交所书的诗轴

每次赴琉册封，册封使及其从客在琉球的时间，少则四五个月，多则八九个月。除了按规定完成各种册封典礼的外交活动之外，使团从客比正、副使有着更充裕的时间与琉球社会各界人士交游，得以各施所长，将中华传统的诗文、书法、礼教、音乐等，通过种种渠道广泛地传播出去，大大地激发了琉球士子与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促进了琉球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而每次册封使团回国后，同样也引发了中华士子与民众对琉球社会与文化的兴趣。从客们的涉琉著述，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翔实的中琉关系文献史料，甚至可弥补册封使“使录”类著述的一些记载之不足。